

創刊號

前  
抗議  
人口販賣  
毒害  
山地

雜誌

決戰華西街

誰在領導民進黨?

- 姚國建「一七一五報告」
- 日據下的台灣學潮

教育基金會典藏

臺灣大學圖書館 數位化



1987年 2 月號

# 目錄

《發刊詞》	春天的祝願		3
《特別報導》	<b>山地悲歌滿台灣</b>	/ 施努來	4
	——華西街示威抒感		
(附錄)	<b>全國婦女、山地、人權暨教會團體</b>	/ 《婦女新知》等	10
	<b>嚴重抗議販賣人口共同聲明</b>		
《文化評介》	走入民間的詩人——石川啄木	/ 荆 果	14
	——兼介其「詩應如便菜」論		
《時事分析》	從選舉到民衆的大聯合	/ 江 澤	22
《新聞評論》	請給他們一個避風港	/ 林 松	29
	——勿以漁民爲政爭的犧牲品		
《海峽瞭望》	中共隔岸觀黨	/ 韋 伍	30
	——中共對民進黨的三點分析		
《時事分析》	<b>誰在領導民進黨</b>	/ 張大林	36
	——從罷選監委看民進黨的權力結構		
《參與手記》	我的脉搏與她同跳	/ 秀 美	42
	——談助選的一點心得		44
《歷史與人物》	日據時代的台灣學潮(上)	/ 林 涯	44
《現場報告》	一七一五報告	/ 姚國建	50
	——揭開人性屠場真相		
《藝 文》	鬪士鬪病死而後已	/ 勞 歸	57
	——紀念傅賴會同學		
《藝 文》	國家·國家	/ 苦 苓	62
	版權頁·編後語		63



# 黃金淚

圖 / 徐仁修  
文 / 林平

在我們南方的故鄉  
從滿州、恆春到枋寮海岸  
有什麼作物能像你一樣  
在強勁的落山風中盎然生長

捱過了冬天的風寒  
盼到了春陽的溫暖  
在歡慶豐收的田野裡  
你累累的金球多麼耀眼

但我的心却被痛苦充滿  
去年的價格是十五塊三  
今年跌到了一斤八毛錢  
血本無歸的滋味真是淒慘

啊！洋葱  
我怎麼老是受騙上當  
只看到你黃金的顏色  
却忘了你眼淚的形狀

# 春天的祝願

對台灣社會而言，一九八六年是關鍵性的一年，在這一年的裡，台灣內部長久以來積蓄、醞釀的力量，終於超越了質變的臨界點，生猛地逆現為我們這個久遭禁錮的僵化社會的新事物，概括而言，一為社會運動的蓬勃發展，一為政治禁忌的大幅突破。

回溯過去一年，鹿港居民於四月間展開了反杜邦運動，這個純粹的環境保護運動，首開台灣地區社會運動走上街頭的先例，並以頑強不屈的自力救濟型態而名聞中外，在九個多月的持續運動中，不但教育了自己，也鼓舞了長年遭受公害侵凌地區居民的環保決心，提升了全民的環保意識。八月間則有林正杰的街頭遊行示威，抗議國民黨以司法審判為手段，連續監禁反對派人士，後續的發展演變成群眾佔領台北司法新廈事件。

九月廿八日，黨外以成立選舉後援會，推薦候選人為名義，在圓山飯店宣布成立「民主進步黨」，台灣的政局至此進入了一個新的紀元。

新黨的成立雖然是一個劃時代的突破，但也只在台灣的政治民主化的漫漫長路上跨出了第一步而已，往後的日子不說，即以成立之後的這兩個多月而言，可謂內憂外患交至，十一月底、十二月初的許信良回台事件，固然助長了新黨的聲勢，但在接機事件中，群眾對於某些新黨領導人的表現不免失望，不過，在數天之後的中央民代選舉中，群眾在厭棄國民黨，又沒有其他更好選擇的情況下，還是把選票投給了新黨候選人，其中，尤以工人團體的國代、立委候選人之爆出冷門，雙雙上亞，最能說

明這個事實。

有人譏刺這次新黨在選舉中的勝利，是國騰崇拜的勝利，是綠底白十字台灣旗的勝利，但我們却有不同看法，作為一個新興中產階級的政黨，在對於工農階級的政治號召上容有代表性不足的問題，但擺在整個台灣的政治局面上來看，肯定會對帶有封建性格的國民黨政權起一定的刺激、促進作用，肯定會對台灣的民主化作出一定的貢獻。

我們對民進黨深切的期許，却在最近的監委選舉風波上受到了質疑，這質疑有兩點：一是民進黨的理想性格問題，一是民進黨的內部凝聚力問題。前者，在市井之間，民進黨籍省、市議員賣票的傳言甚囂塵上；後者，因為這次罷選風波，造成新黨內部權力中樞和地方議員之間相互指摘，以及議員彼此之間劃清界限的舉措，凡此種種，都是不祥的分裂之兆，不免令人對新黨的前途擔憂。

除了說明我們對於民進黨的登上政治舞台一則以喜、一則以憂的心情之外，我們還要表示一個更大的祝願，但願廣大的工農群眾能早日擁有自己的政治代言人，而不再像目前一樣，在缺乏利益代表的情況下，每次選舉時只能給別人「插花」，成為別人的政治資源而已。要達到這個政治目標，當然還需要長時期的努力，但觀乎年來社會運動的蓬勃發展，人民權利意識的大幅提升，加以解嚴、解凍傳說的言之鑿鑿，不免令人心生「鴻鵠將至」的企盼。

春天的祝願，這祝願不是毫無根據的幻想或一廂情願的頌禱。春天的祝願，實現這祝願的現實基礎不在於當權者的施捨，而在於廣大工農群眾的覺醒與團結。







爲什麼山地少女、山地雛妓「就業」於大都會綠燈矮屋下。

爲什麼山地少女成了這個社會「人肉市場」的搶手貨。

爲什麼山地女性一進入「文明社會」便必須以肉體當作唯一的謀生工具

爲什麼山地婦女染上了出賣自己「山肉」的風氣？

爲什麼後來才入居台灣的漢人，要以搶購山地雛妓爲他們最高的享樂？

爲什麼維持社會秩序的警察也愛上了「埋沒」良心的買賣？

爲什麼這個社會，這個國家視販賣人口爲開發台灣的必要條件？

爲什麼塞滿「四維」、「

八德」標語，「民族主義」口號響徹雲霄的這個國家，「山地雛妓」却成爲茶餘飯後的補冬「珍品」？

難道，生存在台灣島上的原住民婦女與生俱來的天職是當娼妓嗎？難道原住民從「後來主人」的身上嗅不出一絲的人味？難道，山地少女的純真僅限於十二歲以前？難道，山地婦女的尊嚴一定要被踐踏、唾棄？

### 臨出發的遊行隊伍

一九八七年元月十日，全國婦女、原住民權利促進會及各教會等卅餘個善心團體，破天荒的在華西街遊行，嚴重抗議販賣人口，抗議警察介入色

情行業。

當天下午兩點在台北萬華龍山寺集合，參加的團體、人員手執抗議標語，披掛黃色布條。二時過十分，一位阿美族少女手持麥克風向與會人員說明遊行所往的街道，然後高唱山地的心聲：「我的家鄉在哪魯灣」以及台語歌「雨夜花」等歌謠。

近二時卅分遊行隊伍開始排列，按社團的次序，沿著廣州街、康定路、環河南路的路綫遊行，沿途高喊抗議的標語：「我是人，不是東西，不要買賣」、「山地少女是我們的同胞！我們姐妹」、「抗議警察介入色情行業」、「雛妓的存在是你我的恥辱」等等，一面遊行，一面高喊抗議口號。

到了環河南路，有位善心居民燃放鞭炮以助陣勢，給予遊行的團體一劑強心針。此時，阿美少女、泰雅、排灣各族之青年輪流拿著麥克風用自己的母語高聲呼喊，道出心聲，接著再用台語面向華西街、寶斗里嘶喊遊行的抗議詞，高喊呼叫聲此起彼落，就連同行的各報記者也加入呼口號，不分中、外、山胞、漢人，大家皆投著救援的愛心，手牽手，心連心，一步緊跟一步的逼近華西街十六巷的少女集中營。

三時卅分左右，隊伍進入嫖客的樂園，有營業執照的妓女巷，由於巷窄，光是遊行隊伍達兩百餘人，加上前來看熱鬧的路人，擠得這條巷水洩不通，寸步難移。這時，山地知青、漢人輪流地向著私娼館以山地各族母語、台語、國語嘶喊「抗議販賣人口！」、「抗議虐待妓女！」、「山地少女站起來！」聲音激憤高昂，遊行隊伍的情緒此時激動到最高點。

在十六巷停留約半小時，妓女戶的老鴉及山地妓女，眼見大批身披黃色布條，手持抗議看板的不速之客，一個個嚇得四處逃竄，來的老鴉或保鏢則慌忙拉下百萬人會進進出出的鐵門，除了示威的人群之外，巷道裡只剩下賣檳榔的攤位以及走避不及的嫖客。有些嫖客在進退維谷之際，只好假裝也是前來抗議的社會人士。

本來每星期六的下午至星期日夜晚是十六巷生意最興隆的黃金時刻。據巷道賣檳榔的中年人說：在星期六的七點至十點半左右，來此尋歡或深熟

鬧的人，有時也像今天的抗議隊伍這麼多，但是今天的生意可能是寶斗里有史以來最差的一天。

## 抗議警察介入色情行業

隊伍在四時十五分左右來到華西街加油站，進行靜坐抗議，四時卅分再次整理隊伍沿貴陽街，轉西園路向桂林分局前進，沿路不斷高喊口號，到達桂林分局之後，一位泰雅青年嘶聲高喊：「抗議警察介入色情行業！」「抗議警察包庇色情！」這時，遊行隊伍呼喊口號的聲音響徹雲霄，高亢激昂的聲音震動桂林分局的門窗。

大夥佔據西園路、桂林路的十字路口之際，剛好是下班時間，使得交通阻塞了幾分鐘。在桂林分局的正門，隊伍又高聲呼起口號，要分局長接受聯合聲明抗議書，要求局長重視販賣人口的社會問題，不過桂林分局長遲遲不肯出來，反而要求遊行隊伍派出兩位代表進入警局呈遞抗議書，然而，此舉却召來與會人士的不滿。

眼看桂林分局主管一直不肯出來接受抗議書，隊伍再次高聲要求局長出來，為此雙方僵持十幾分鐘，最後局長經不起抗議人士的堅持，終於從分局出來準備接受抗議聲明書。抗議書由一位女性代表遞交，並要求局長保證絕不包庇人口販賣份子及縱容警察介入色情行業，局長當場接受抗議團體的請求，至此才多少紓解了現場群眾的激情憤怒，最後，由李元貞女士宣佈活動結束，人

群方才逐漸散去，第一階段抗議販賣人口的遊行就此落幕。

## 山地雨夜花的悲劇

然而，對山地知青而言，第一波示威行動的落幕並不代表這一抗議活動的結束。反之，應該更努力反省、檢討，從反省到覺醒，由覺醒到實際的參與行動，以我們自己的力量來拯救山地的危亡。

雖然，政府尚未調查娼妓在本省總人口中所佔的比例有多少，但如衆所周知的，在台北三步一家理髮廳、五步一家色情按摩院的情形下，賣淫的行業已隨著經濟的繁榮、生活的富足而日益猖獗起來。在日益猖獗的色情行業裡山地同胞所佔的比例之高，已經到了可怕的地步，根據台灣省政府第四科，在一九七七年所供出的報告裏，山地人口佔台灣全省的一·七七%，以這不足百分之二的人口，而却提供了在全省各黑街暗巷隨處可見的娼妓，由此可見山地部落出外賣淫的人口比例有多高！

根據最近的電視報導，在花蓮縣秀村鄉，凡是二層以上的鋼筋水泥樓房，大都是同胞鄉民賣女兒所換來的。為什麼在山地社會販賣女兒，出賣肉體的比例高出平地社會？或許，我們可從高山族在現代社會，調適不良的情況看出一點端倪，了解山胞為何有「男的上船，女的上床」的悲劇存在。

## 從桑田到滄海的 山地變遷

高山族在現代社會中的調







整與適應是一個錯綜複雜的問題。

就文化而言，在四百年前，當高山族完全未與漢文化接觸之前，山地民族因應了台灣的地理以及氣候的條件，而孕育了自己的文化。三百多年前，漢人逐漸移居台灣，高山族人才開始和漢族文化接觸，不過高山族與漢人之間尚分界而居，到了日本統治台灣期間，在高山族村落設立學校，為高山族人首次全面地受外來文化。光復後，國民政府把山地行政歸屬於一般民政管理，普遍設立學校以謀山地人生活的改進，因此大大地影響了山地文化。

可是，高山族社會真正因外來文化的影響，引起較基礎性的變遷，是在民國五十年前後，當時省民政廳實施山地保留地的測量與調查，使高山族對土地私有權有了新的認識。另一方面，國內工商業的發展，市場經濟的觀念改變了一向自給自足的族人，加上工廠的興起，人力的需求激增，促使

山地青年湧躍入城求職，於是這個時期開始，山地青年的調適起了很大的變化，不僅在社會組織，乃至於人生觀、宇宙觀等方面都有變化，加上在族人固有之文化與漢文化接觸時，每每有相互衝突的情況，使得入城求職的山青在處處碰壁的情形下，只有以最原始的本錢——勞力來賺錢，但是因為資本主義消費觀念藉著強力媒體對山地社會的洗腦，使原本沒有貨幣觀念的山地同胞逐漸地對金錢的需求日甚。都市繁華的消費情境更吸引大批的青年向城市移民。

### 山地同胞的國內移民

山地同胞向城市移民的人口比例，據省民政廳所做的報告，在民國五十一年前佔高山族總人口二．四％；九年之後，佔總數的四．七％，到了民國六十六年，增加了八倍，也就是佔山地總人口的卅七．六％。從民國五十一年到民國六十六年，在短短的十五年間，

高山族移居城市出現如此高的比率，必然會產生調適的困難。再從民國六十六年到七十五年，在這九年期間，知識的爆炸、工商業的復起、經濟的繁榮、生活的富足，甚至奢侈，更使得高山族人移居城市的調適困難。在沒有更好的謀生技能的情況下，多數的山胞青年只有走上出海入坑的坎坷路，而山地少女則走上賣淫的不歸路。

在全省總人口僅佔百分之二弱的高山族，以正常的統計來算，要在大都會裡找到賣淫的同胞應該不太容易，然而演變至今，我們隨時都可以在私娼寮、公娼館、酒廊、色情理髮廳找到我們的同胞。再以山胞總人口卅二萬來計算的話，扣除老弱婦幼以及男性青年，山胞少女約有十萬人左右，在十萬人當中再扣除部份的學生、殘障者，剩下來的人口應該不會超過七萬人，以這區區七萬人口，却在全省的人肉市場上「出盡鋒頭」，可見山地少女從事色情行業已達到如何泛濫的地步。

### 結語

山地民族的危機是全面的，從民族自信心的喪失，到消費觀念的被強制改變，造成經濟的徹底破產，最後造成民族母性的流失，到了這一步的話，整個山地民族也就瀕臨於滅種的邊緣了。我們的田地森林可以被搶奪，我們的勞力可以被榨取，但是請還給我們民族的母性，請保留我們民族的一線生機。

# 全國婦女、山地、 人權暨教會團體 嚴重抗議販賣人口 共同聲明

她剛昇上六年級，今年未滿十二歲，來自青山綠水秀麗無比的家鄉。

經過一位警察太太的介紹，她由美美阿姨帶到台北去「見表妹」，抵達之後，她發現繁華熱鬧的都市，只是一條暗無天日的黑街。

她的初潮未至，由於發育未全，妓院強行為她注射荷爾蒙針劑。

買了若干衣服之後，第二日馬上接客。客人給阿姨一個大紅包，以後她每天接客的數目由三十名到五十名不等，因為嫖客對越是稚齡的少女有越喜歡的傾向。

淋病、「菜花」等性病也令她無法消受。

她失去與親朋連繫的任何機會，一舉一動都受到監視，保鏢如影隨形、亦步亦趨。

做到半途，家人後悔欲以贖回，却已無力與黑道幫派抗爭。賣身契雖然於法無效，却有暴力作後盾。

風聲鶴唳時，老板會輾轉把她賣到其他都市的暗巷。

她是被押賣的，是被「綁」的，所以只有零用金，每接一個客人，老板給她新台幣十元，但是老板一次則向客人收費新台幣三百元。

當日子快到時，老板說還要多做兩個月。因為最先的兩個月中，她是生手，算做「實習」。

她較為年長的妓女姊妹們，有的在生理期間照常接客，不得拒絕，嫖客在肉慾血水中咬牙辱罵，妓女苦在不言之中。

上述例子，是雛妓被押賣可能遭遇的綜合情節。是我們掌握各個不同實際個案之縮寫。

隱含在這些事實的後面，可以發現平地人口販賣集團背後的操縱，山地連絡站之昂然設立，執行單位上下其手執行不力；我們也看到受到利誘的無知貪婪的父母，黑社會人士依附在色情場所恣意壓榨，剝奪雛妓對外通訊與人身自由，對其收入層層剝削，將女性視做商品，以非人道，喪盡人類的尊嚴的行為相對待。

乍聽人口販賣之名詞，人們動輒思及數世紀之前，弱肉強食蠻荒世界之景象，然而放眼今日安和樂利的台灣，色情行業猖獗氾濫，少女從娼之頻繁，尤其原住民少女之大量流入風塵，不能不拜人口販賣集團利用法律漏洞及人性弱點，所做穿針引線汲取厚利之賜。試想十二、三歲之山地少女，竟得以在各地私娼寮中暗操賤業，若無販賣人口之情事，她們如何在懵懂無知的年紀，一片白紙般的社會經歷下，進入都市中龍蛇雜處，最為複雜黑暗的地域？

世界人權宣言第四條規定：「任何人不容使為奴役，奴隸制度及奴隸販賣，不論出於何種方式，悉應予以禁止。」

保障人類生存自由之權利，不受任何惡力壓制，已然成為世界之趨勢，在現今二十世紀末的台灣，我們不能坐視發育未完全之少女受人不斷地蹂躪與擺佈，喪失成長期間應有的快樂與光彩，我們更不能任令少數民族的山地少女一個個成為煙花，其人權受到無以倫比之剝奪。除了要求執法機關確切取締非法犯罪之外，我們身為婦女，山地、人權與教會團體的一份子，皆有道義義務來正視它與關懷它。

## 婦女團體嚴重抗議人口販賣

最近新聞媒體連續披露婦女被賣、被迫從事娼妓行業的事件，顯示販賣女性人口的問題不僅一直存在，而且毫無改善。人口販子、妓院老闆、嫖客、保鏢，加上警界的姑息，形成一個堅強的企業連鎖，以婦女為貨品賺取暴利，剝奪女性的人身自主權。山地婦女受害最深，貧窮無助的平地婦女也有許多受害，這是對女性最不平等的待遇，造成最慘痛的婦女問題

婦女被賣為娼所受到的剝削是常人難以想像的。不但身體易染上各種性病、傳染病，還會受到保鏢、嫖客的毆打虐待。老闆為了套牢她們，誘她們吸毒賭博。少女被強行注射荷爾蒙，好早日接客。她們常被轉賣各處，與親友及正常社會隔離，陪客人出去而不明不白的死去，也不太有人重視。在心理上，她們更是嚴重被扭曲。做為一種貨品，自然沒有人的尊嚴可言，故罹患精神病的很多。

色情行業對婦女的摧殘也是隱藏性的，從娼妓婦女除了少數例外，多半是隱藏自己的血淚，不肯向社會透露，使她們的問題更不被人知。她們出賣肉體的錢常被大老闆、皮條客、保鏢、不肖警員瓜分。加上是非法企業，娼妓得不到任何保障。她們又是被取謫、拘留、坐監的待罪羔羊，其他獲利人反而逍遙法外。

在我們的社會裏，常提及娼妓問題時，常以遏止色情為重點，將娼妓問題視為端正風化的道德問題，卻對在色情行業中受摧殘的婦女人權未加重視。其實，娼妓產生的社會背景與父系社會婦女的地位低落有關。傳統的父系社會中，婦女根本被視作男性的附屬品和財產，無從靠能力在社會上就業，若不為人妻妾，或出賣原始的勞力，否則只好走上娼妓之路。

近代婦女開始受教育，不少貧窮婦女因有就業能力及機會而免於淪為娼妓。但婦女的就業情況仍比男性低落太多，婦女靠能力而拿高薪的機會仍被各種社會條件所局限。一旦為經濟所迫，只有從事色情行業，可以較快賺到較多金錢。許多愚昧的父母也承襲了以女兒的身體兌換金錢的男性社會積習，更助長人口販賣業的氣焰。

再以城市中的人口販子紛至較為貧窮的山鄉地區買女為娼，及人口販賣國際化，經濟弱國婦女被賣往經濟強國的情況來看，更能顯現色情行業的本質，就是經濟力量占優勢的國家、階層、性別，在剝削經濟力量居弱勢者。

我們可以說，色情行業是男性剝削女性，經濟強者剝削弱者的一種方式。想要徹底消除色情行業，首應推動男女平權、城鄉及山地居民機會均等的社會，訓練婦女的就業能力，提供婦女就業機會。同時我們更要呼籲：

一立即嚴格取締、處罰強迫未成年少女賣淫的人口販子，至少使雛妓，尤其山地少女，不被逼良為娼。

二政府或民間團體一起合作，成立婦女庇護所，收容想從火坑裏跳出來的女性，並施以心理輔導和技能訓練，幫助妓女從良。

三希望我們社會不再以色情來吸引觀光客，減低色情行業對婦女同胞所設下的重重陷阱。

四建立一套管理娼妓的方法，幫助她們維護身體的健康及利益不被過分剝削，阻止嫖客對她們的性虐待。

五在不能立即廢娼前，讓娼妓成為正式行業，成立同業工會，使她們可以學習自己保護自己。

六實施正常健康的性教育，對於變態性心理及行爲，應送到醫院治療。最後，再輔以兩性平權社會的建立，逐漸廢娼。

## 嚴重抗議人口販賣

原住民少女是未來原住民族的母親，將決定民族的延續存亡。今日原住民族總人口佔全台灣省人口總數尚不及百分之二，她們確實擔負相當艱鉅的民族歷史使命。但因逢急變的社會「混亂」了原住民生活傳統的步調，帶給原住民少女奇慘的人間命運，與遙遙無期的前途，使她們成為文明人「狩獵」的最佳「山肉」，任人剝榨血肉，失去人權、尊嚴和自由。自詡為擁有五千年文化守禮好義的民族，怎能忍受公然擄人為娼，誘拐無知少女、人口販賣、戕害無辜少女，使之飽受摧殘的事實，踐踏人性的尊嚴。

原住民原屬台灣的主人，但今日台灣整個社會，並未給予原住民自有的文化傳承相當的尊重及人性平等的尊嚴，對原住民的地位與權益未給予法律保障。山地政策的各項「法規」，因年久失修，存有許多不合時宜，與山地社會現實脫節的法令。山地的政策與執行，最大的偏差，總是將「販賣子女」的「因」解釋成原住民生活的「貧窮」，而忽視山地經濟的「貧窮」是在毫無防禦能力之下，成為台灣整體經濟急變過程中的受害者，亦認為原住民偏嗜

杯中酒及不善理財與缺乏儲蓄觀念，或好逸惡勞及缺乏謀生技能，造成原住民生活普遍貧困，而不願去發現原住民的困境是處境不公平及其政策偏差下的結果，反而假藉「濟貧法」來使原住民從貧窮線上消失。

今日原住民少女淪為文明社會夾縫裏的「畸零人」，成為別人存在玩弄的個體，嚴重暴露目前政府改善原住民生活的輔導、扶植及行政上的缺失，法律威信缺乏赫阻力，制裁力量薄弱，缺乏販賣人口處罰專案，實難以遏阻販賣人口案，反經由「媒色」管道與地方有名人士結合，換取糊塗父母的信任，藉假契約、假借據及假僱傭合約之名義掩護非法行爲，連結妓女戶、私娼館，組成最嚴密的賈淫網路，配合無知的父母與賈淫行業幕後操縱者安排否認其罪行的「技巧」或「方法」，暗結無職業道德良心的不法警員，組成重重相護之連鎖體系，與各方互通密訊網，形成一種違反人道的畸型現象。

販賣子女是今日原住民不得已的求生之道？子女已是原住民生在台灣社會僅剩的最後一項資產，一朝被賣，終生為妓，原住民幼苗可危，若全國同胞及有關單位不再重視，及時採取行動，原住民未來的前途和命運將可預卜。原住民少女陷身在暗無天日的「地獄谷」，關懷原住民幼苗的「救贖」行動在那裏？

## 共同呼籲

今天，我們在這裡公開宣稱：我們要堅決反對販賣十二、三歲少女的罪行，徹底反對人口販子逍遙法外，強烈反對警察人員介入色情行業，堅決反對警察「知有其情，查無實證」的畸型辦案現象，強烈反對強迫妓女接客無辜之惡行，徹底反對賣身契期外加兩個月接客實習期之惡行。我們還要嚴重抗議無辜少女被迫簽署「志願當妓女，賺錢還錢」的志願書，強烈抗議利用假契約、假借據及假僱傭合約掩護非法之賣身契，嚴重抗議無辜少女一朝被賣，層層轉賣，輾轉交易，終生為奴之非人道的罪行，嚴重抗議「半途不贖身」的賣身契，強烈抗議為未成年少女注射女性荷爾蒙針劑之罪行

，嚴重厲議戕害妓女注射避孕針（狄波）劑之惡行，嚴重抗議非人道剝削「血肉」的商業罪行。

不能容忍這樣一個非人道、不知人性平等與尊嚴、視弱女子為賤物的社會毒瘤，我們表示最深切的憤怒、最嚴重的抗議、最徹底的反對！

我們駁正公開人口販賣之一切罪行，我們

- 天主教台北教區美滿家庭中心
- 天主教社會發展委員會
- 玉山神學院
- 活石教會
- 七美教會
- 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事務所
- 原住民權利促進會
- 台灣人權促進會
- 愛家聯誼會
- 天主教德蓮中心
- 天主教青友中心
- 天主教愛生青年中心
- 天主教同工聯會
- 天主教聖高隆會
- 天主教普愛會
- 天主教福利會

- 晚晴婦女知性協會
- 《女性》雜誌
- 台北婦女展業中心
- 長老教會婦女宣道委員會
- 長老教會北中婦女事工委員會
- 台大人口中心婦女研究室
- 彩虹專案
- 《婦女新知》
- 《高山青》雜誌社
- 全國山大基聯會
- 旅北原住民同鄉會
- 山地服務中心
- 山地勞工福音之家
- 山地大專學生中心
- 山地宣道委員會



• 藝文(詩) •

# 走入民間的詩人—— ——兼介其「詩應如便菜」論



我的世界

世界之眼中，唯我獨醒，  
 站在蔓草掩覆的丘陵上，  
 屏息的大地橫亘於足下，  
 正如挽我而行的生命之車，  
 浩蕩的鏤星夜空，  
 是披在頭上的一頂笠。

呀！此為我的世界，當  
 朝風晨曦重臨時，  
 將還原復舊，離去我的支配。

然而，世人應知，在我胸中，  
 有一「思」之世界，正是此一世界  
 為超越一切的不動之國度，  
 因而我從不悲、亦從未有所失，  
 即使此一世界，時時還原，  
 還原為衆人蠢動的，如舊世界。

牽牛花

呀，縱令歲延百毒，  
 因在黑暗的牢舍裡何值眷念！  
 我，寧願醒在光明中，  
 求一日生命的榮耀！  
 一夜的煩眠幾多悶思，  
 昏耗的身，倚立在朝陽的門，  
 （猶是慈光之憫笑乎？）  
 淚眼獨對牽牛花！

月與鐘

天路遙遙 鄉思中飄浮著  
 嫋嫋歌韻將盡，  
 櫻花苑中 樹影朦朧，  
 請彈奏出一片夢色吧，  
 月下人！

# 石川啄木 / 荆 果

石川啄木，本名一，啄木的筆名為其師名詩人與謝野鐵幹所取，是日本明治末期詩壇的一顆彗星。生於明治十九年（一八八六年），逝於明治四十五年（一九一二年）。享年僅止廿七。

啄木短促的一生，可以說是貧病交煎，從沒有過舒泰的日子。文士落魄古今常見，但不遇如啄木者似乎也不多。

他的詩作歷史頗早，第一本詩集「憧憬」，於卅八年出版，時年僅廿。作品多屬於浪漫象徵詩、遣詞綺麗奇拔、詩思靈敏清澈，天才啄木之名，一時大噪於京。

然以一介弱冠新進，稿酬至為菲薄，幾乎不足以餬口一家。為了尋求較優厚的寫作環境，他幾次往來奔波於東京和盛岡之間，甚至一度北走風雪深鎖的北海道。啄木生來體弱，辛勞中患上了肺病，相繼不絕的貧苦、病苦、再兼家不和之苦，逼他幾次想自殺以了却一切。

可是，纖細中天生的一分傲氣，和執拗的求真求美意慾，還有對一無恒產的家庭的責任感，每每牽住了他的逃避衝動，且漸漸使他的心路歷程在嚴苛現實的重壓下轉變了方向。數年掙扎，他的作品中逐漸收起了蒼白少年文士的自傷眼淚，代之而顯出來的，是毅然面向那橫在生活底流下的社會罪惡的吶喊。在他死後出版的詩集《哨子和口哨》中，我們可以讀到從生活的煉獄中重生過來的啄木的、化柔美為凌厲、變感喟為抗議的激昂作品。據說在戰後的日本，頗有人將他看成日本近代普羅詩之祖。不論前期浪漫主義的瑰麗作品，或後期血汗交迸的生活詩歌，至今很多仍膾炙人口。據報導，他的「歌碑」也已建立在他故鄉的一處崗頂上，藉以悼念這位早逝的天才詩人。

今試譯數篇被目為可分別代表前後兩期的啄木的詩，以資讀者們做一比較。





其二

花已眠，而人子之夢  
難圓，祇因旅愁萬劫  
牽我進那無醒之夢鄉吧，  
夜半鐘聲泣月人！

以上三篇，皆收在詩集《憧憬》中。（一九〇五年出版）

《我的世界》顯然是一篇孤傲和自醉的、精神勝利者的作品。而《牽牛花》則屬於半類唐的，自嘲的利那主義頌。「求一日生命之榮耀」而不可得的啄木的眼淚固然引人同情，但那是從不堪回首的過去和黯然無光的未來的逃避。而逃避中的生命，何來榮耀？啄木却渾不自覺。《月與鐘》追求的是技巧上的雋永效果。論內容，不過藉幻視幻聽，襯出一種朦朧意境美。總之這時期的三篇詩所代表的，是在痛苦中猶未病醒，圖以幻思自我救濟的、孤獨自傷的啄木。然請再看收錄在詩集《哨子與口哨》（一九一三年逝世後出版）中一篇題為《無盡議論之後》的長詩中的三節：

其一

昏黑、昏黑，宛如一片曠野的  
我的腦海中，  
時而電光一閃，  
我知道，那是革命的思想靈光一。

奈何，奈何，  
那 快的雷鳴，却未聞傳來一。

我知道，那一閃電光照耀下的  
世界有新姿。  
在那裡，萬物皆得其所一。

昏黑、昏黑，宛如曠野的，  
在我腦海中，  
時而有電光一閃，  
我雖知道，那是革命的，思想靈光一。

我們且讀、且議論，  
我們眼裡的銳光，  
實不輸於五十年前的俄羅斯青年。  
我們議論著，我們該做甚麼，  
我們爭吵著，我們能做甚麼，  
然而尚無一人，以緊握的拳頭，  
擊打桌面，  
喊出 V NAROD！  
（註：俄語「到民間去」）

我們素知，我們所求為何，  
亦知，民衆所求為何，  
更知，我們該何為，



然，尚無一人，以緊握的拳頭，  
擊打桌面，  
喊出 V N A R O D !

今宵聚首此屋者，都是青年，  
常在世界上，創新的青年，  
我們明知，老人們不久離去，  
我們將終獲勝利，  
請着，我們眼中的銳光，  
請聽，我們議論之激昂，  
然，尚無一人，以緊握的拳頭，  
擊打桌面，  
喊出 V N A R O D !

呀！蠟燭已再換，三換，  
飲料杯中漂浮著小蟲屍骸，  
年輕婦女的热心顯未減退，  
眼裡却已露出，無盡議論後的困乏，  
然，終無一人，以緊握的拳頭，  
擊打桌面，  
喊出 V N A R O D !

其三

我知，TERRORISTI的  
一顆悲戚的心——  
那種言語與行為已密不可分，  
僅有的，一顆心，

只因，言語被奪，  
只有，以行為說話的心。

自己將自己的血軀，擲向敵人的心，  
那是，真挚而熱心的人們，  
常有的悲戚！

無盡議論之後，  
一吸冷却了的可可，  
在微苦的舌尖上，  
我舔出，TERRORISTI的  
悲戚的，悲戚的心——。

任何人都看得出，《憧憬》時代的啄木和「哨子與口哨」時代的啄木，在不及十年的歲月推演中，已經是判若兩人。後期三節詩，很清楚地告白世人，從前沉湎於自傷世界中的啄木，現已投身於一自覺的、清醒的、群眾共鬥的洪流裡。他的喜怒哀樂，都已經過社會理性的淨化而顯出前所未有的真實和清白，詩的震撼力也就更加强了。

他的這種轉變，曾使他的師友驚異，也使一般讀者驚訝。不過，氣質與詩質的劇烈改變，當然不盡是緣自於他個人純主觀的自發因素。我們更須留意的，是當時正處在遞變中的日本社會的特質，帶給一位善感的青年詩人的絕大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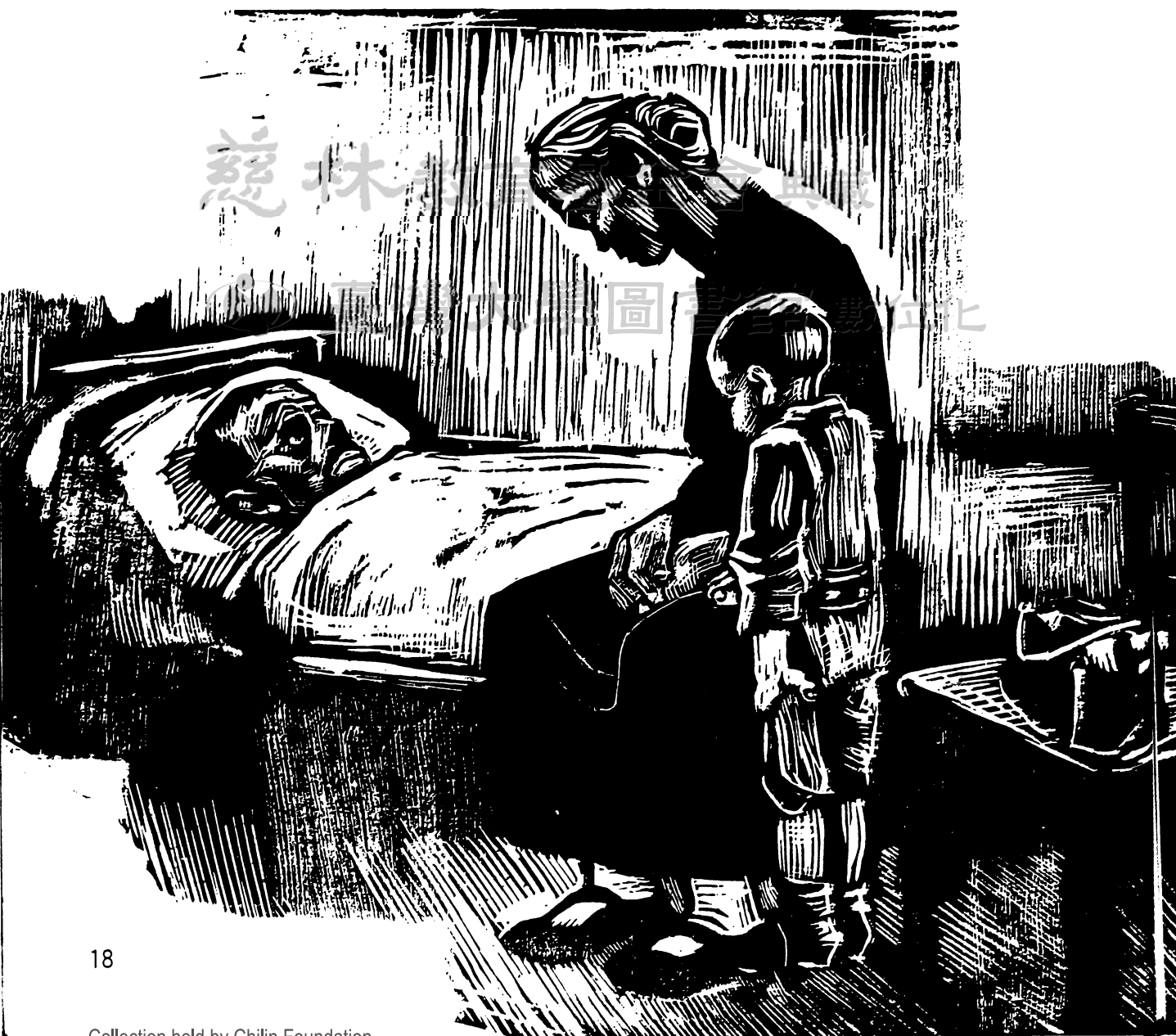
如眾所週知，彼時的日本，經過中日、中俄兩次以國運為賭注的冒險戰爭後，已躋身於本世紀初的列強之林。視其社會內部，則明治維新後一長段破舊立新的紛爭已告落塵，舊封



建土地資本的殘餘和維新初期的「政商」集團，在中央集權的「殖產興國」政策鼓勵呵護下已完成了體質改變，近代式的壟斷財閥與藩閥政府的結合體，對外已顯露出經濟軍事強權的面貌。一方面階級分化漸見分明，藩閥政府下的民權運動雖不絕如縷，但多以擴大有產者參政權為目標。而新資本貴族階層下面，真正受壓榨的，是廣大的，却無聲呻吟的農工大眾。然自明治卅年代始，世界性的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思想運動，也漸有流入這個新興工商帝國之勢，出現了一些第二國際支持下的革新團體。例如，開始於明治卅一年的「社會主義研究會」、集村井知至、安部磯雄、片山潛、幸

德秋水等人，自開研究聖·西門、傅利葉、蒲魯東、馬克思等近世社會主義思想的風氣。改稱社會主義協會後，更積極推動普選和勞動立法運動。明治卅四年，第一個勞動者政黨，社會民主黨出現，在其宣言中提議以和平民主過程達成八大項社會改革。日俄戰爭前一年，幸德秋水的《社會主義神髓》，片山潛的《我的社會主義》二書公刊問世，在青年學生及農工大眾中引發極大震撼。

至日俄戰爭發生，堺利彥、幸德秋水等人組織平民社、發行《平民新聞》，譯載《共產黨宣言》，鼓吹和平反戰思想。一時在國民大中的知識分子和工農分子受其影響者漸多、



軍國主義批判及和平反戰運動的萌芽漸明。如啄木的師母，被譽為一代才女的女詩人與謝野昌子，竟敢於在學國沸騰的軍國主義狂潮中，對身在炮火連天的旅順前線的胞弟，發出一篇題為《我弟！你不能死！》的詩，以引人落淚的骨肉至情，和熾烈的人道主義精神，斥責「馬革裹屍」的嗜戰口號。雖也受到不少國粹主義者回攻，所幸當年的藩閥政府對國民言論的鉗制不若昭和年代軍閥政府之甚，在一片辱罵聲中仍得以流傳一時。

受以上這些時潮的衝擊，啄木原有的理想主義小我世界逐漸瓦解，終至開眼於更高層次的社會自覺，勿寧說是極為正常的現象。他開始撥出部分寫作時間，閱讀一些新進來的社會科學方面的書籍，憑其銳敏的領悟力和得自生活體驗中的洞察力，他的思惟漸有了方向，而他的人生觀和藝術觀，也在這一段時間逐漸走上成熟的境界了。

詩論《詩應如便菜》，是啄木《克服浪漫主義，跨越自然主義》的力作，可視為他的不竭的探究心的落實點。明治四十三年六月，無政府主義者幸德秋水的「大逆事件」發生，震動全國，啄木尤深受衝擊，更加勤讀有關政治經濟方面論著。於同年八月間，寫就《時代閉鎖之現狀》一文。繼而設法取得幸德在法庭上的答辯書，漏夜抄寫，細加研究，進而精讀克魯泡特金「告青年書」，其革命社會觀愈形堅固。在極端的困難中，和志同者數人着手籌辦新雜誌，暫名為《樹木與果實》，惜因病而無成。四十五年病情轉劇，終於四月間辭世。

綜觀啄木一生，備嘗貧病辛酸，加上家中姑娘失和，夫妻不睦，幾可以說集人世間多項不幸於一身。然正因長年纏綿於苦中苦，反而激起了自我鞭撻的意志力，從失魂落魄的深谷底奮力攀登，終於達到一處能鳥瞰世態百相的精神高處。他若不早逝，以他熾烈的正義感和使命感，透過天才的表現力，或能成為近代日本的高爾基。無怪乎戰後日本文學界，不時掀起啄木再評價的運動。至於有關他的詩作技巧和詩論要旨，因距今已有四分之三世紀，當無新義。然他那永不熄滅的詩魂，在一個激盪中的社會重壓下的悲壯呼喊，至今仍能深深地感

動人，對現代作詩者尤能發揮有力的啟示作用，則為不爭的事實。

在《詩應如便菜》這篇詩論中，啄木首先對自己的詩作心理過程和精神狀況，以尖銳却甚平實的筆調，做了徹底的剖析。開頭一句話，就是這樣：「對於詩，我曾經迷惑了相當長的一段時日。」他要強調的，無疑是當時幾種流派的詩所共有的病象——虛偽加繁瑣。他是這樣說的：「以前我也做過詩，是十七、八歲以後的兩、三年間的事情。當時，對於我來說，世界上除了詩以外不存在甚麼東西。從朝到晚，我好像整天地憧憬著甚麼，這種心情，只有作詩的時候，才覺得幾分的發抒。」而當時的詩是甚麼樣的東西？他說：「是空想和幼稚的音樂，再有，是一些微弱的宗教因素。」他有如下具體的告白：「從一個實際上的感受到一首詩的成形，中間需要相當繁瑣的手續。舉例說，當看到在一塊空地上站着丈許高的樹，陽光照着它，即你一定得把這塊空地變成曠野，把丈許高的樹變成參天大木，把陽光想成不是朝日便是夕陽，不僅此也，還得把看着它的自己想成是位詩人，或者是位旅人，或一位多愁的年輕人。不如此，便不符合當時的詩的格調，自己也得不到表現慾的滿足。」

啄木本身不久便開始厭煩這種「詩化」的「手續」。他不再陶醉於「詩人」、「天才」一類的「揮發性」稱呼，代之而來的，是種莫名的空虛感。我們相信，啄木的這種空虛感，正是促成他開始另一角度的摸索的預兆。其間的機因，不外是，實際上說甚麼也「詩化」不了的現實生活的重擔。他說：「二十歲的時候，我的境遇發生了極大的變動。返鄉、結婚，與此同時，不擁有任何財產的一家老小的餬口責任，一下子降到我的肩上，而我對於這種變動，竟是束手無策。從那時起，一直到今天，我所承受的痛苦，無疑是所有的空想家，也就是，逃避責任的極端的卑劣漢所應接受的懲罰。尤其是像我這樣，除了詩和與此相關聯的可笑的矜持外，不擁有任何技能的人，受罰應該還要苛刻一點。」他對詩，由留戀到悲哀，由悲哀到自嘲。他說曾有一次，在北海道一個小市鎮，當地出身的一位老政客，帶他到一家小

報社，介紹給對方說「他是新體詩人」，他承認，那是第一次從別人的善意中得到了侮蔑。

對於當時剛起步的一些社會的，及文學的革新運動，他這樣描述他是如何開始接觸它。「跨越思想與文學兩個分野上的新運動，在爲了求食而北走再北走的我的耳邊，竟然也響起來了。對空想文學的厭倦，和從實際生活中得來的一些體驗，不久使我吸進那種新的運動精神。當時的心情，恰如站在高處眺望着剛走出來的那間房屋正在起火燃燒。」他爲了菲薄的月收，在零下三十度的北海道「流浪」過。不勝寒苦，終又回到本土，且上東京。他說：「就像回來的我已經不是以前的我，東京也不是以前的東京。我驚奇地發現，對新運動抱持同情態度的人意外地少。我感覺到一種悲哀。我退一步自我審查過。但仍然堅信，從北方風雪中帶回來的想法，即使幼稚，也非錯誤。」在這期間，運動的低潮、生活的逼迫，令他煩悶不已，曾經寫過四、五百首的「短歌」。他

他之所以作短歌，是要「虐使」一種詩型，從而得到一種失敗者的快感。

他還幾次想自殺。但，相繼地又發生了幾件事情（文中沒有明說究屬何事）當幾乎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時，他的責任心又把他從消沉的谷底硬推上來。他如此地描述當時的心境：

「從前覺得可笑的事情，現在變得一點不可笑了。」這還不等於說，他要以嚴肅的、理知的責任心，去面對一切可笑與不可笑的生活現實嗎？不錯，這就是不死鳥啄木的復活了！

復活過後的第一課題，便是重新對於詩與詩人，給予確實的認定。也就是，賦給詩與詩人，新的性質、新的存在理由，否則，他的復活便將再度落空。

從前的他，飄飄然自以爲是詩人的他，到頭來竟然是個假詩人：則復活後的啄木，必須是位正正當當的真詩人。那麼，真詩與真詩人，應該如何界說呢？果然，緊接着上面那句話後，他立刻提到：「現在的心情，使我第一次



真正體會到新詩的真精神。」「所謂『詩應如便菜』，就是說，那應該是兩腳踏地歌出來的東西：用一種和實際人生之間沒有任何空隙、任何間隔的心，做出來的東西。不是山珍海味、不是高等料理，而是恰如我們日常生活中的便飯、便菜一般，尋常普通，却是不可或缺的東西的意思。這種說法，也許會被認為有意把詩從某一高位置拉下來：但在我來說，這是從來在生活中可有可無，不帶給生活任何增減的詩，變成人生中的必要物之一的途徑。肯定詩的存在理由的唯一途徑。」那麼，到底所謂的詩人，應該是甚麼樣的人呢？他說：「簡單地說，我要否認被稱為詩人的，一種特殊人物的存在。對於一個寫詩的人，別人稱他為詩人，那倒沒甚麼不當。但他本身，絕不可以自認為有別於『俗人』的『詩人』。這種說法或許有點缺當，但當他自認為詩人的時候，他的詩便會墮落，會變成對大家不必要的東西。」「統而言之，對於凡是和他的詩沒有直接關係的事物，向來不抱有任何興趣、熱心或希望的，從前那一類詩人：像一隻餓狗求食，整日到處只求『詩』的詩人，必須受排斥。意志薄弱的空想家：不敢把自己及自己的生活，委之於嚴肅的理性判斷的卑劣漢：專以表現劣敗者的悲哀來自慰的懦弱者：閒暇時以戲玩的心理寫詩讀詩的，所謂的『愛詩者』：以及故意表露自己的神經不健全的偽患者，乃至於所有這種種人的模仿者，總之，凡為詩而寫詩的那一種類的『詩人』，必須極力加以排斥。不用說，寫詩這件事，沒有理由成為任何一個人的『天職』。『我是詩人』這樣的不必要的自覺，如何地使從前的詩墮落，『我是文學家』，這樣的不必要的自覺，如何地使現代的文學遠離我們的需要呢？」顯然，他要把詩從不實的官能美化，糾正為生活中真憑實據的必要物。

由憑空的求美到踏實的探真，無疑這是對空想家，耽美主義者的唯一處方。因為唯有真實，才是所有的美的母胎。請看啄木所期許的真正詩人：「為要改造自己，實行自己的哲學，應有如政治鬥士的勇氣；為要統一自己的生活各層面，應有如實業家一般的熱心，而且經常以科學家的明敏判斷，野蠻人的直率態度，把自己內心裡起伏不停的變化，不加矯飾，不

弄虛偽，極為平易而正直地記錄下來，報告出去，這才是真正的詩人。」有些人向來主張詩的純潔性，認為唯有詩，才是所有藝術中最為純粹者。但啄木却認為，「這種說法有如主張蒸餾水是所有的水裡邊最純粹者，即使是性質的說明，也不會成為有無必要的價值標準。」

「未來的詩人，絕不可有如此的主張。且必須峻拒一切對於詩及詩人的，毫無理由的優遇。所有的文藝，一如其他事物，對我們來說，應該只是生活的手段與方法。詩的尊貴化，只是一種偶像崇拜！」

對於一些早年新詩運動的同路者，啄木深以他們的低潮與徘徊為憾，也提出了幾許的希望和要求，做為這篇詩論的結尾。

「諸君認真的研究，素為缺乏外語知識的我所羨慕和敬佩。但諸君是否由這樣的研究，一面獲益，另一面又在受禍呢？……說得率直一點，諸君是否隨着詩的研究的進展，在由此得來的知識上面，正要構成另外一尊新偶像，而忽略了理解現在的日本呢？或者說，諸君為了熱衷於把舊詩變為新詩，而忘却了改造自己及自己的生活這樣一項大事呢？換言之，諸君是否正在重復諸君曾經排斥過的『詩人的墮落』呢？諸君是否有必要把排在桌上的美麗的詩集燒掉幾本，回復當初推動新運動時的那樣的胸懷呢？……。」

看完這篇取題獨特的詩論後，相信讀者們的感受絕不僅是七十多年前的舊瓶舊酒。即使認其為舊瓶，內容所裝却仍然是那樣的清冽芳醇。時光流逝留不住一瞬一刻，新人老去老人隱去，物況景色無常，但歷史的曲折性却往往嘲弄似地把一些老問題披以新面紗，呈現在我們眼前。也往往以似舊面貌，展出新時點的問題。我們驚奇於啄木在文中所關切的，竟然與不久前在這個社會上發生過的現代詩爭議，內容焦點極近相似。那些關於詩與人生、純粹性與關連性、詩人人格與社會責任等等，有關現代詩的弊病和救濟的諸問題，悉皆可以在此文中見其基本輪廓的初描和粗略的試答。七十多年前一位貧病交煎下的異國青年詩人，辛苦萬分地走過來的路，竟然還一直延伸着，直到今天，仍然是那樣的坎坷，那樣的風砂襲人！

● 時事分析 ●

# 從選舉 到民衆的大聯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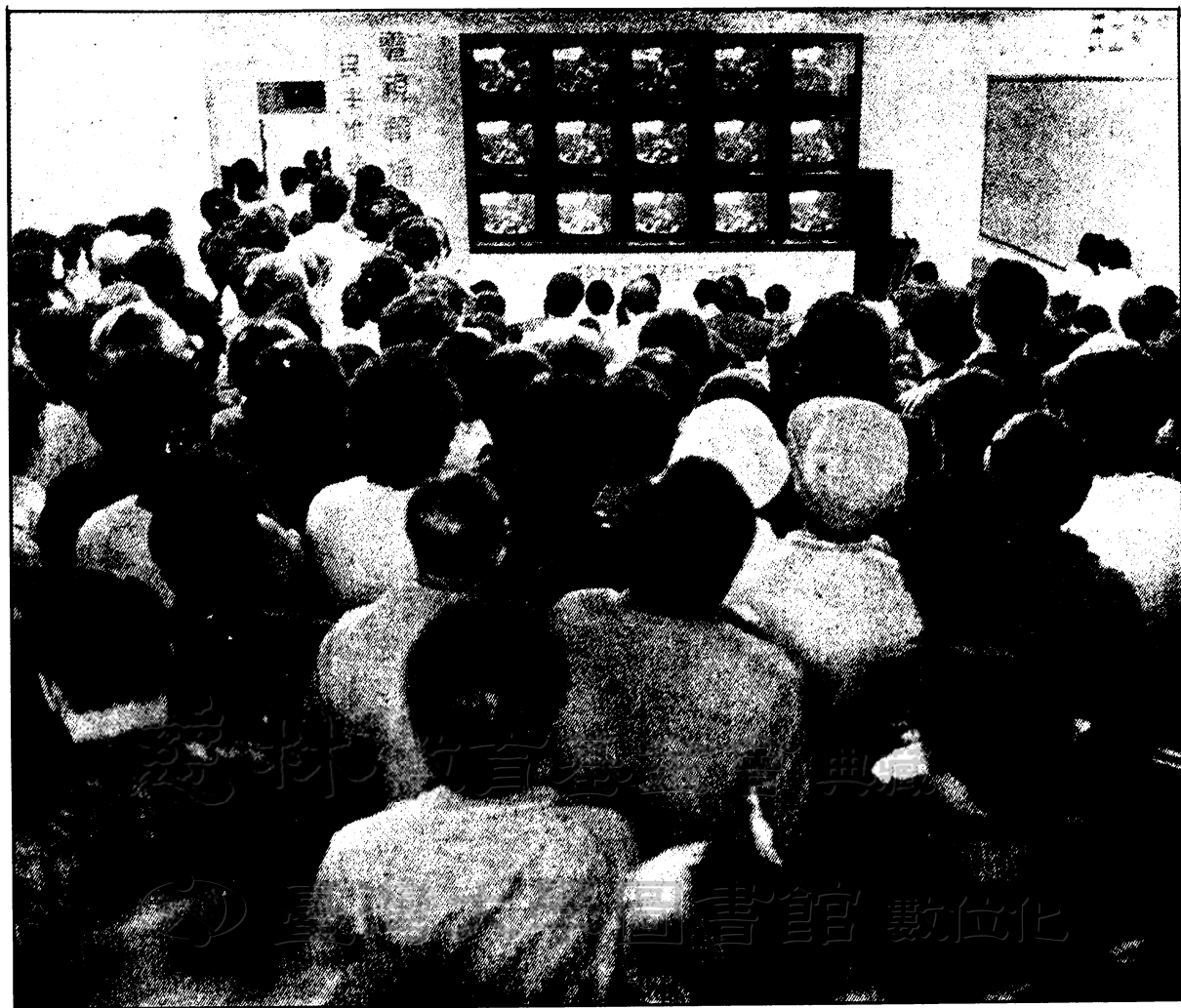
/ 江 澤



新黨候選人政見會盛況

台灣的反對勢力可以分爲兩個部份，一個是政治性的選舉運動，一個是社會運動。選舉運動，主要是要求制度的合理與政權的開放。從選舉運動中幾個常見的口號——「回歸憲政」、「開放黨禁」、「解除戒嚴」、「保障人權」、「裁軍」、「中央民代全面改選」、「總統普選」等等——我們就可以印證上面的說法。

社會運動爭取的則是一個社會的公平與正義，是整個社會的問題。當中起著領導作用的自覺份子，認爲一個社會的不公不義，來自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剝削者與被剝削者之間、壓迫者與被壓迫者之間的矛盾。他們認爲透過組織工作與紮根工作來喚醒民衆、聯合民衆是最重要的問題。但在國民黨的高壓政策下，以往這些自覺份子一直欲振乏力，得不到民衆



「小眾傳播」在這次選舉中顛覆了被國民黨壟斷的大眾傳播

的熱烈支持。

一九八六年是關鍵性的一年，政治性或社會性的反對運動都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就在這一年，民主進步黨圓山「起義」成功，突破了多年的政治禁忌，成為花瓶黨除外的第二黨，反對黨終於建立，兩黨制算是初步形成。

也就在這一年，以鹿港反杜邦運動為代表的「新社會運動」，如火如荼蔓延全島。從台中三晃化工廠因嚴重污染被居民強迫停工，到高雄縣永安鄉設立路障，禁止中油液化氣槽建造工程車通行；從計程車司機在台北和台中的集體抗議車行剝削，到勞資爭議的不斷急速增加等一連串事件看來，被國民黨欺騙、壓迫的台灣人民，已經受不了了！台灣人民再也不是國民黨的「順民」，個別、孤立的不滿串連成

集體的抗議，民衆開始懂得團結才有力量，學會自力救濟，認識到真正的民主，就是人民當家做主。

在這個巨變的年代，社會的動力在那裡呢？

選舉是一個社會結構發展的反映，是一個社會的生產關係在政治層面上的表現，而所謂政治生活對於工商社會中的一般民衆來說，其實就是選舉。只有在選舉這個「民主假期」，一般民衆才會節慶式的參予政治生活。接下來，我們要从這次選舉來看工人、農民這兩個台灣人口中最龐大而生活最困難的階級，做為一年來最主要的社會運動的生態運動與選舉運動的關係。





工人團體選舉突破國民黨禁地

## 臺灣的工人站起來！

反對派立委、國代都當選了，國代候選人徐美英最高票當選，立委候選人王聰松則第三高票當選，台灣的工人站起來了！在這次選舉中，工人有幾個動向是值得注意的。

一兩大工會頭子落選了。全國總工會理事長陳錫淇在立委選舉，台灣總工會理事長彭光政在國大代表選舉中雙雙落選，這顯示出國民黨扭曲了的工會，作為工人的代言人是無效的，勞工用他們在職業團體中的選票表達了強烈的抗議！

二工人團體選舉人數大減，比往年少了三成左右。這些工人大都轉投區域選舉，這顯示出工人在本身沒有組織、沒有政治代言人的情況下，對於民主進步黨作為目前唯一的反對黨有強烈的支持與願望。

三民進黨在職業團體選舉部份的候選人徐美英（國代）與王聰松（立委）名不見經傳，連選民都不知何許人也，可是却高票當選了。這顯示出工人對國民黨籍候選人因長期失望而產生了強烈的排斥感，而對民進黨候選人抱著新黨新希望，工人的反對意識開始抬頭，工人不再是一群沈默的國民黨投票部隊。

四另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是民進黨國代候選人徐美英所得九萬票與立委王聰松所得六萬多票之間的差額，這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我們可以說是因女工選票的關係，徐美英是國代選舉職業團體部份唯一女性，這顯示出婦女意識的抬頭！

在這次工人團體選舉部份，民進黨突破性的攻下國代、立委各一席，在工人為主要人口的高雄市、台北縣又都高票當選，嚇得老K急著要設立勞工局，陳錫淇與彭光政這兩大工會頭子宣稱他們是背負了台灣工人運動的十字架，我們不如說他們的落選，是承擔國民黨二、三十年來對幾百萬廣大勞工剝削、壓榨、欺騙的惡果。



## 怒吼吧！農民

中部第三選區是台灣主要的農業地區，在這個大家樂令人瘋狂的地帶，民進黨立委候選人許榮淑再接再厲，捲起一陣旋風，以一九八六年立委選舉最高票十九萬一千多票殺進立法院。

這個地區的人口結構，絕大部份選民是農民或農村子弟，在幾十年來國民黨「犧牲農業

，發展工業」的政策之下，在一個城鄉急驟轉變、對立的過程中，農民作為被犧牲、遺忘的一群，在這次選舉中發出了憤怒的吼聲。

許榮淑是怎麼將農民個別的不滿、憤怒全面的動員起來的呢？她的選戰策略模式和大家樂在某個意義上是相同的。

「大家樂」是一種民衆對國民黨的壟斷經濟下的金融秩序、利潤分配的集體顛覆性活動，相對的另一個意義都是民衆對國民黨的霸權的挑戰，對現有制度下理性的質疑，而訴諸於一種非理性的「圖像」（好比說簽號、簽詩、乩童等怪力亂神的東西）。這「圖像」所代表的是農村社會中民衆在長久受著不公平待遇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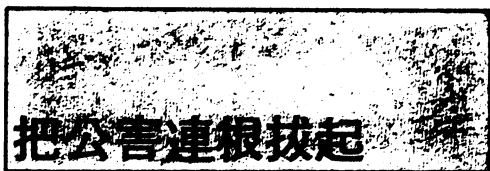
在農業地區高票當選的朱高正、許榮淑

工人團體立委王聰松、國代徐美英

產生的對現存社會的絕望與對正義、公平的渴望，太平天國的例子是一個典範。

許榮淑的選戰策略掌握了民衆情緒的動向。她很巧妙地運用政治犯家屬的身份，一方面表現出與農民同爲這個社會的受害人，另一方面在越衝越激進的選戰過程中，把自己化身爲農民在絕望中所渴望的正義力量的「圖像」，這種類似大家樂式的、非理性的動員方式，就如同大家樂令人瘋狂，使封建而迷信的農民把希望寄託在許榮淑身上。

農民的封建個性使他們在地方選舉中，常常受到主要是以血緣關係結合起來的地方派系所把持，這次許榮淑的突破，反映出一些農民的不滿。這些不滿主要是因農會功能的僵化與萎縮，農產品生產被高度剝削與承擔著工業污染的農地、農業資源的極度破壞這幾個問題產生的。怎麼動員農民來解決農村問題，解除他們自己的枷鎖，這是很值得思考的。



在這次選舉中，生態問題是個熱門話題。但是，就選舉做爲一種社會結構發展的反映看來，基本上生態意識反映在選票上是令人失望的。

這個問題可以分成兩個部份來談，一個是有運動的地區，好比說反公害運動的重鎮鹿港；一個是把生態問題當成時髦話題的城市，好比說國民黨與民進黨候選人都大談生態問題的台北市。

在第一種地區，選舉並不能反映出當地社會力的發展。例爲彰化的黃溪南等以反公害爲訴求的候選人，在鹿港的得票率仍然偏低，這

朱高正率中港農民上街請願





鹿港反社邦運動打開了社會運動新局面

一方面是因為人力財力不足，選戰沒打好，但就另一層意義來看，却顯現出農村地區地方派系勢力在政治上的主導性力量，並沒有被新興的社會運動所瓦解、所取代。選舉只不過是個現代人的大拜拜，它跟人民的生活關係，並沒有像社會運動（環保運動）與民生問題那麼息息相關，有著生死與共的關連。

環保運動做為一種民間自發、自覺的社會運動，是源於社區意識的抬頭。所謂社區意識是奠基於住宅、土地及其所身處的人際關係上的，從這個角度看來，環保運動無疑是農民運動的再現。這個論點就可以解釋為什麼社邦尚未設廠，鹿港居民就可以起來奮不顧身地反對，而深受公害之苦的高雄地區，環保運動却發展不起來。

農民運動有其自日據時代而來的優良反抗傳統，在短短一、兩年內就發展為一股軍警特務都壓制不了的環保運動，無非是建立在這農民運動的基礎當中。這也是為什麼社會運動的

急速發展無法在選舉中突出，因為它是和地方派系的力量重疊的。

反觀大城市中，無論國民黨或民進黨候選人，一般說來，以環保問題為政見訴求，都只是因為它是個不得不談的熱門話題，事實上對於票源的開拓並沒有多少幫助。

但是，一旦環保問題與消費者意識結合起來（如垃圾問題與食品衛生問題的結合，保特瓶與速食餐具就是例子），再加上個人的形象魅力，對於中產階級是會產生極大誘惑的。

但事實上，我們不能就這麼理解環保問題，即把它看作是消費上的問題。環保問題必須擺在社會經濟結構中來看，也就是說環保問題是生產領域中，生產成本轉嫁為社會成本時所產生的問題。好比說工廠排放的廢水，廢氣、廢塵、輻射沒有妥善處理，這替工廠老闆節省了一筆可觀的費用，却由社會大眾承擔其惡果。

在這次選舉中，前面所說的那種候選人（



中產階級  
週末式的  
社會關懷  
無法改進  
社會

環保話題+消費者意識+個人魅力)只談消費過程中的環保問題，却成功的爭取選票，顯出中產階級的環保運動針對的只是商品流通(消費)過程的環保問題(好比說什麼拒絕二手菸運動)，而沒有正本清源地深入從商品的生產來看環保問題，這無非只是轉移環保問題的焦點，軟化環保運動反對國民黨政經壟斷的根本性格，將它變成一種中產階級週末式的社會關懷。

## 結語

反對運動追求的不只是法律上的公平，制度上的合理，政治、經濟被國民黨壟斷，即使頒佈一種好的法律，訂下好的制度，也必然會被反動的舊勢力阻撓，妄想順暢實行是不可能的。

反對運動追求的也不只是政權的開放，即使從一黨專政變成兩黨制，人民依然沒有可能

當家做主。好比說一個村莊開了一家雜貨店，本來是唯一的一家，所以利潤驚人，後來開了另一家，有了兩家，要買東西總算是多了個選擇。但事實上當生意少，兩家競爭時，或許會在表面上討好客人減價，暗地却動了手脚，一旦供不應求，則兩家聯手抬高價格，老百姓就更加苦不堪言了。

從上面對工人、農民與環保問題的分析看來，在台灣反對勢力中，社會運動超出選舉運動很多，這顯示出唯有社會真正改進，人民才會當家做主。人民要當家做主，統治者只會心驚肉跳、坐立不安，思尋怎麼壓制，統治者是不會「賞賜」給人民民主的。人民要當家做主，社會運動提供了一個方向，那就是民衆的聯合會產生巨大的力量，連國民黨龐大的國家機器也壓制不了。今天冒出頭來的社會運動，算是民衆的小聯合，就從這些小聯合開始吧！讓我們向民衆的大聯合齊心攜手奮進！

# 請給他們一個避風港

## ——勿以漁民為政爭的犧牲品

／林松

據報載，國防部在答覆立法委員質詢時表示：由大陸漁民十二人偷渡入境的案例，顯示我國海防（岸）警備確實亟待加強，除責成有關單位確實檢討，以落實海防戰備外，並採取了一連串措施，如：對海岸重要地區配置陸空通訊連絡系統，適切調整海防班哨兵力佈署，有效運用雷達、探照燈等監控器材，嚴密近海巡邏……其中有一項最不可思議者，為訓令海防部隊不准大陸漁民靠岸避風。

按台灣及中國大陸東南沿海為亞熱帶溫帶氣候，每年夏秋之交，有無數颱風來襲，雖然目前通訊設備十分發達，颱風可以預先警報，但為數頗多的台灣近海漁船，他們的作業區南至珠江口，北至黃海一帶，每遇颱風便就近向大陸沿海漁村或港口緊急避難，從來很少遭受到拒絕或刁難。我政府和中共政權一樣都宣稱代表全中國，按皆應以不分台灣或大陸之全國人民為國民，加以妥

善的保護，設若我政府對大陸漁船、漁民採取臨危不納的政策，那大陸可能會有兩種反應：

其一是採取報復手段，也對前往大陸沿海避難的台灣漁船採取拒不接納的措施，這樣的一報還一報好像十分公平，但雙方在得失之間却相去甚遠，按我方近海漁船數目衆多，又因為設備優良的關係，其活動能力極強，往往可以深入接近大陸漁區，加以大陸沿海海岸綫綿長，海域遼闊，我方漁船散佈在這一廣大區域作業，一遇颱風，回航不及，往往只能就近避入大陸沿海漁灣港澳。反觀大陸漁況，因為漁區廣大，漁場優良，加以設備簡單，所以他們的漁船很少深入海峽近接台灣西岸，偶而在我方避難亦為少數案例，在這種情況之下互相採取拒而不納的措施，顯然吃虧的還是我方的漁民。

其二是不反應，繼續接納我方的避難船隻，這在雙方爭

取民心的競賽上必然要佔優勢，除非政府能嚴禁漁民寧可葬身海底也不可入大陸避難，但這樣的一紙禁令除了不人道之外也根本無法執行。

在近接大陸一帶海域作業的近海漁船，颱風來時就近上岸避難，已成了漁民的常識，同時也是當局長期以來所默許的行為。這除了表示政府的自信與對人民的信任之外，也具體落實了台灣與大陸都是中國領土的這樣一個概念。若只因因為大陸十二個漁民上岸「觀光」，我亦反其道而行，因噎廢食的結果，將不免於弄巧成拙，因為如前所述，不管大陸方面採取什麼樣的反應——若以眼還眼，則造成我方漁民極大的不便與損害；若不反應而繼續「寬大」接納台灣漁民，那共方贏得的就只是如我方之為幾百噸漁獲而已，得失之間不難估計。

在這個問題上，國民黨政府難道不應為漁民爭一時，也為自己爭千秋嗎？

●海峽瞭望●

# 中共隔岸觀黨

## ——中共對民進黨的三點分析

/ 韋 伍

據香港《廣角鏡月刊》記者在北京獲悉，民主進步黨在台灣成立的消息傳到北京後，中共有關部門召開過多次政情分析會，中共當局綜合各種渠道報上來的材料和情報，最後達成的幾點結論是：

第一、新黨出現是島內政情的重大發展，值得密切注視。

第二、新黨的性質和立場尚未明朗，官方不置評論，以待觀察，中國大陸的新聞界可作客觀報導，但不作主觀表態。

第三、也是涉及是否調整政策的關鍵一點，即新黨雖有一定的民意基礎，但永遠談不上取國民黨而代之，台灣目前也無可能出現聯合執政，因此今後對台工作的重點仍是國民黨當局。

台灣新黨以及許信良閩關事件對中共的衝擊，只是加深了中共對「台獨傾向」的注意。彭真反對「台獨」的整段談話，是中共中央書記同意後特意加上去的。

本文轉載自香港廣角鏡月刊 171期，1986年 12月 16日

民進黨成立大會



## 胡耀邦會見黃順興、張春男 說明了什麼？

《廣角鏡》上一期《中共對台政策有新變化》一文，獨家報導了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會見台灣黨外人士黃順興、張春男內情。由於這次會見的时间恰逢台灣民主進步黨甫告成立之際，更加引起外界的注意。在此之前，中共對台灣新政黨一直態度曖昧，而胡耀邦，既是中共中央總書記，據悉也是中共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的主要成員，他對台灣政局看法當能反映中共對台政策的最新動向，因此這次會見，無論從時機上或談話內容方面，都十分敏感。

### 值得注意的第二點意見

《中共對台政策有新變化》一文，提到「胡耀邦著重提出三點新意見」，一是「爭取用和平統一的方式解決台灣問題，並不排斥用其他方式」；二是「以台灣當權者為主要談判對象，但也重視其他愛國力量和人民的力量」；三是統一後「將照顧對統一有功的當權者的利益，同時也照顧其他愛國力量 and 台灣人民的利益」。

第一點和第三點談不上有何新意，這類觀點，中共領導人在以往其他場合多次陳述並強調過，成為眾所周知的中共對台政策的核心部分。

### 「當權者」何所指？

從表面上看，胡耀邦口中的與台灣當權者談判，這與過去中共領導人常用的「兩黨談判」「國共合作」顯然不同。例如1983年6月，鄧小平兩度接見海外學者均強調兩岸和談「不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談判，而是兩黨談判」。以上這種微妙的差異究竟說明了什麼？是否能因此得出中共對台政策有了「新的變化」？

筆者利用最近去北京採訪之機，就以上問題向一位朋友——亦是一位專事對台工作官員求教，結果得到了否定的答案。這位朋友認為



蔣經國垂垂老矣

，胡耀邦口中的「當權者」，實際上還是指國民黨政府，他說，之所以用這個提法，是有特定的談話氣氛。當時大致的情形是：黃、張兩人向胡耀邦反映，許多台灣人對中共把國民黨作為主要談判對手的政策很不滿意，覺得有點輕視台灣人民的力量。胡耀邦則一再解釋道，中共之所以要把國民黨作為談判對手，才能消除統一的根本障礙。（大意）

黃順興、張春男以「客卿」之身，面對中共總書記這位大人物敢於直抒胸臆，坦陳異議，勇氣可嘉，而胡耀邦以一黨之尊，不恥下問，洗耳恭聽，也難能可貴，但這一切不足以證明中共對台政策因島內政情有重大進展而有所修正。

### 中共仍以國民黨為和談對象

據《廣角鏡》報導，黃、張在會見之後，他們兩位覺得中共領導人對和談對象的提法有新意，如果台灣人民取得了政權，也就成了和談對象。筆者以為，黃、張兩人的理解與胡耀邦的本意恐怕有一段距離。

台灣民進黨呱呱墮地，成為海外華人社會轟動一時的新聞，中共官方傳播媒介是有及時



報導，但據朋友介紹，新黨出現，在中共高層並沒有引起太大震撼，這倒並非中共對台灣政情掉以輕心，而是基於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及由此形成的輕重判斷。

中共曾提出過「兩個希望」的口號，在對台工作的實踐中，中共則深深感覺到，只有掌握台灣新政權的國民黨政府認同和談統一的建議，兩岸合作才有可能進入實際運作階段，自從確定以和談促進統一的戰略方針後，中共始終把推動第三次國共合作作為對台政策的核心部份。胡耀邦對黃、張的談話證實此點。十一月十二日，彭真在北京紀念孫中山誕辰大會上強調：「目前的關鍵是國共兩黨開始對等的談判」，這種前後一貫的說話也充分說明中共對台政策基本策略並無更改的跡象。

「要和談只有和當權者談，國民黨是台灣當權者，便要以國民黨為談判對手」，這樣的觀念實在是深深根植於中共領導人頭腦中，對於中共的這一心態，相信黃順興、張春男本人也會有過深切的體認。

### 黃順興說X書記不了解台灣實況

北京朋友以參加者身份告訴筆者一樁鮮為人知的內幕。黃順興去年十月來大陸不久，受到中共書記處書記X的接見。交談中，黃順興表達了中共以國民黨為重點的對台政策的迷惑與不滿，這位與國民黨打了大半輩子交道的X書記聞言大為不快，雖也作了一點解釋，但言詞間充滿了教訓人的口吻。結果雙方不歡而散，事後黃順興私底下對朋友說，X書記不了解台灣情況。而在場的新聞界人士也對X書記如此「雅量」感到吃驚。

### 中共對民進黨有三點看法

現在的問題是，在台灣出現新黨之後，特別是「民主進步黨」在最近的選舉中，奪取十一個「國大代表」席位，十二個「立法委員」席位，實力和聲勢大增之後，中共是否據此以為台灣的各種政治力量出現新變化，而意欲修訂政策，向新黨招手示意？

據朋友透露，民主進步黨成立的消息傳到

北京，中共有關部門召開過多次政情分析會，綜合各種渠道報上來的材料和情報，最後達成的幾點結論是：

第一、新黨出現是島內政情的重大發展，值得密切注視。

第二、新黨的性質和立場尚未明朗，官方不致評論，以待觀察，中國大陸的新聞界可作客觀報導，但不作主觀表態。

第三、也是涉及是否調整政策的關鍵一點，即新黨雖有一定的民意基礎，但遠遠談不上取國民黨而代之，台灣目前也無可能出現聯合執政，因此今後對台工作的重點仍是國民黨當局。

### 胡耀邦詢問新黨人事

依筆者之見，新黨對中共的衝擊，與其說是引起權力交替的猜測，倒不如說增強了對「台獨傾向」的注意更符實情。據朋友介紹，胡耀邦與黃、張兩人二個多小時的會談中，新黨並沒引起他太多話題，胡耀邦只是問一下新黨



的人員情況，未有具體談及自己的看法。爾後彭真在紀念孫中山誕辰大會上的講話，却以相當篇幅提到要警惕有人「支持台灣獨立」，進行「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活動。據權威人士指出，彭真的整段話是有關方面經過慎重考慮並經書記處同意後特意加上的，決非彭真個人的泛泛表態，而是針對島內政情作出的一種含蓄的反應。以上兩點事實，間接證實了筆者的上述分析判斷。

### 許信良回台灣的揣測

中共對「兩黨和談」的迫切心情是溢於言表的，但是否就直接插手台灣近來政情發展？這裏有項材料頗值得玩味，十一月廿一日香港一家報紙一篇報導稱，「據說台灣政府情治機關已從匿居弗吉尼亞洲麥克蘭別墅的前中共同安部情報處處長俞強生口中探悉，許信良回台是受一隻無形巨手操縱的……一旦許信良踏進台灣，某方就會僱聘菲律賓新人民軍殺手把他幹掉。這樣勢必會引起寶島政局激盪，掀起大

台灣人民的力量正在凝聚



走上街頭的反對黨





許信良闖關失敗，回不了台灣



規模街頭暴亂，有可能在一夜之間搞垮國民黨」。

### 中共會希望台灣爆發革命？

報導未點明「某方」為何方神聖，但既然消息是從俞強生口中洩出，自然是中共一方了。讀罷這則報導，給人的印象是，中共有意搞亂台灣政局，企圖從中得到好處。消息的真偽一時無法考證，但只要中共對台政策有所了解，就會明白，中共其實並不希望台灣島內發生「革命」，更不會介入島內的「革命行動」，中共所願看到的倒是台灣政局穩定。其間的道理很簡單，一是國民黨歷來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只要台灣在國民黨控制之下，就不會走上獨立的道路，至於何時統一，則可從長計議。二是中共的如意算盤，是統一後的台灣在一國兩制下保持社會安定，經濟繁榮（這一點倒是與香港模式相同）而並非「革命」造成的破壞局面。

一位權威人士在向筆者分析上述消息時指

出，中共的情報部門或外交人員就算再沒「水平」，還不至於糊塗到在事關對台大政方針上與中央一再申明的精神唱反調，採取報導中說的「搞垮」的愚蠢行動。這位權威人士認為，某報的這則報導，純屬無稽之談，甚至可以說是別有用心。

### 中共如何寄望於台灣人民？

中共有「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說法，但究竟「寄」了多少希望？又花多少氣力去「寄」？一個令人十分遺憾的事實是：中共一些領導人及底下一大批對台工作人員大多對台灣情況一知半解，懵然不知者亦為數不少。筆者與一些中共官員聊天，發覺他們腦中，「自決」與「台獨」就是一回事，甚至把「鄉土意識」亦視為「台獨傾向」。連人家的想法都沒搞清楚，「爭取民心」從何談起呢？中共至今似乎仍不明白，台北敢對北京的「三通」呼籲置若罔聞，那是因為「三不」政策在島內還有一定的基礎，只要島內民衆對中共的疑慮與恐懼心



人民在怒吼

理還十分強烈，國民黨就可篤定維持孤島偏安的局面。本來，面對多元化的局面，應該有多元化的準備，否則局面就難以突破。對此，中共應有什麼新設想呢？

### 只強調兩黨談判也不合理法

中共在對台工作中表現出的一些觀念也應改變。比如，所謂「兩黨談判」，於法理觀念說不通。統一事業是國家頭等大事，理應由政府來承擔責任。按國際通例，凡分裂國土雙方的談判，均以政府名義進行，中共却對「兩黨談判」情有獨鍾，很有點黨凌駕於國家之上的意味。

無須諱言，國共兩黨以其執政地位的實力，必將是未來和談遊戲的主角，但在海峽兩岸均努力追求民主法制的當今，由兩黨包辦國家統一談判的想法，不是有悖民主潮流嗎？有人提出用「兩岸執政當局談判」代替「兩黨談判」的提法，筆者深有同感，並建議中共當局認真考慮為是！



林正兩的街頭運動捲起上街風

• 時事分析 •

# 誰在領導民進黨？

——從罷選監委風波

民進黨的成立就是在黨外後援會的選舉推薦會上



# 看民進黨的權力結構

/ 張大林

民主進步黨成立四個月來，不斷經歷一連串風險及風波。先是國民黨雷聲大雨點小的圍剿及設限的動作，繼則發生接機事件，取消巡迴助選活動，最近之監察委員罷選風波，更使民進黨內部歧見加深，黨紀面臨考驗。新黨遭遇各式各樣的風險通常也是考驗其韌性的時候，但如果對於風險處理不週全，便可能成為導致新組織癱換或解體的致命傷。

以這次罷選監委為例，民進黨領導層與有選舉監委權的台灣省及台北、高雄市議會民進黨議員雙方之間，顯然對罷選與否存在重大歧見，否則民進黨中常會不會兩度作成罷選之決議。這件罷選監委風波，其實是反映民進黨內部組織的結構問題，此即：一個組織鬆散，以選舉為主要活動內容的政黨，其領導層的成員與通過選舉考驗而選出的各級民意代表，如果重疊性不高，一旦雙方意見發生不一致，黨的決策如何貫徹？

## 「選舉掛帥」的 反對派政治文化

台灣的反對派政治文化一直以「選舉掛帥」為中心。任何反對派人士，若只有學歷而沒有選舉經歷，或只有政治經驗（譬如說坐政治牢）而未經歷過各種層次選舉的考驗，在反對派陣營裏，便很難建立其發言地位的份量。過去沒有組織形式的黨外時代是如此，今後在有形的民進黨組織內，兼具選舉及另外一項經歷之一的才有可能成為令其他同黨人士折服的領導人物。



我們再觀察民進黨民意代表對於民進黨中央罷選決議的批評，更可看出，具有成功的選舉經歷者所作出的領導動作才較具權威性。去年十二月廿一日出版的「亞洲週刊」(Asia-week)在詳論民進黨內部爭執時，就曾引用一位民進黨民意代表助理的話說：「那些激進份子，從未贏過一次全島性的選舉」。

助理口中對於沒有選舉經歷者是如此輕蔑，而民進黨部份民意代表更是認為「選舉」是民進黨中央決策人員必須擁有的經歷，否則其所作出的決策便會造成尷尬的局面。民進黨籍省議員黃玉嬌在評論民進黨中常會的罷選監察委員決議時表示，民進黨中央罷選的決策太慢，而且主要幹部嫌年紀太輕，「無實際參選經驗。」不僅黃玉嬌以有無參選經驗來評論民進黨中央的罷選決議，其他一些不滿該決議者，也是主張以「選舉」經驗或公職人員的意見為黨中央在考慮罷選與否時所必須參考的內容之一。

例如，台北市議員王昆和說，民進黨決議形成的方式是由下而上結合而成，「(決策)應尊重民進黨候選人的意見」。立法委員許榮淑說：「中央黨部執行決策行政人員應多與地方公職人員商討研究，求得共識」。立法委員吳淑珍說：「黨中央應全面實施黨內民主制，不要以少數幹部意見作最後決定」。立法委員王義雄說：「黨中央決議之前，應先徵求各方意見，黨員個人利益才能兼顧」。

其實，按照現在民進黨的體質，黨中央與公職人員發生齟齬毋寧是正常現象，因為民進黨乃是黨外地方派系為主流結合而成，各派系之間，除了在批評國民黨的立場方面步調較一致之外，黨內並未具備有同質而堅強的思想理念，而且成立時間還短，內部若有所謂「整合」的工作，也是成效未彰。而現行黨章所建構的權力結構，其實是遷就地方派系分立的現實，要藉以日常黨務運作而達到整合的目的，實際上有它的困難。首先，作為全黨象徵的黨主席是一位沒有實權的虛位「元首」。黨章第十五條規定，黨主席任期一年，且不得連任。一個新成立的政黨，百廢待舉，亟需推舉一位強有力的人物，給予較長的任期，才能從容規劃黨務。因此，規定主席任期一年，尚有可取之處，一年一度的黨主席選舉，對於尋求連任者可起考核作用，但如限制不得連任，則任何人縱使有三頭六臂，在短短一年間亦不可能有多大的作為，更不可能做長遠的規劃。

### 主席輪流當的黨中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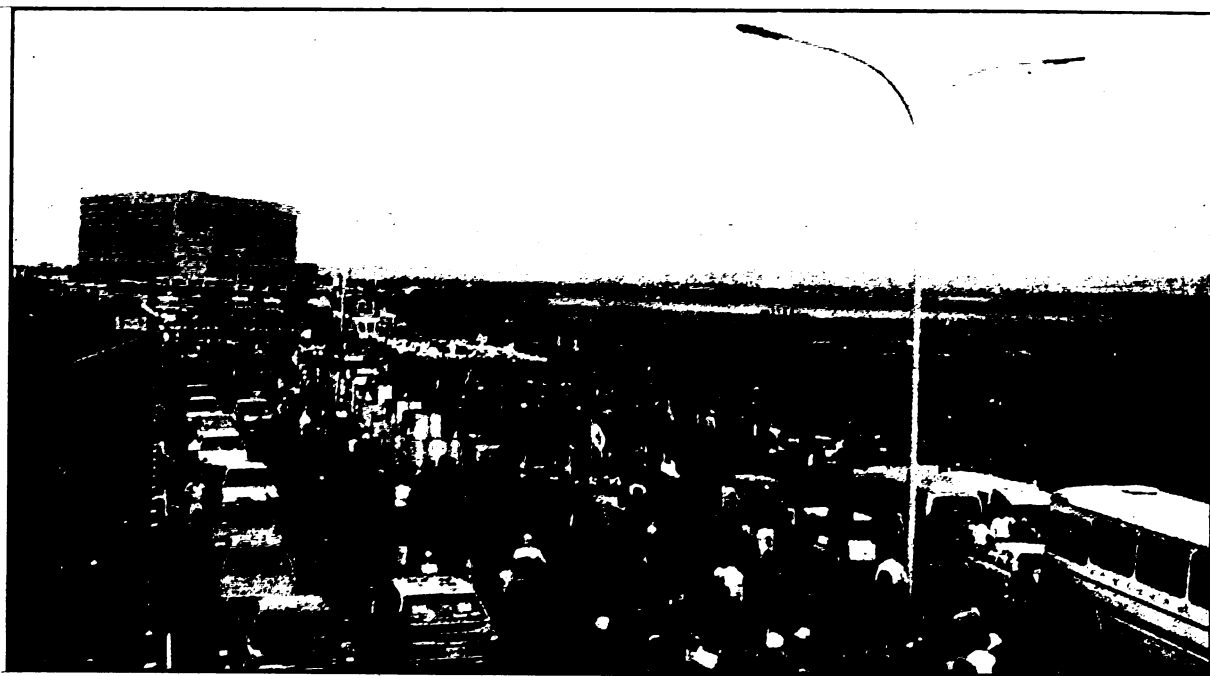
再者，民進黨黨章規定黨主席的權限只有一種：提名中央黨部秘書長及副秘書長(黨章第廿條)，但只是提名權而已，同意權仍屬於中常會，而中常會是採合議制(十五條)顧名思義即是以多數決定而不是以黨主席的意志作為中常會的決策，此時，黨主席權限與其他中常委並無不同。黨章甚至

未規定每週至少一次的中常會(十七條)由誰召開。

從以上分析可知，民進黨的中央領導層是採取集體領導制，黨主席只是這個領導層的名義領袖而已。這樣的安排固然能夠貫徹黨章第八條所謂，「本黨之組織採取民主方式運作」的要求，避免事權集中於一人而發生一人獨裁的現象，同時這也反映了目前民進黨內部的實際權力結構現狀。此即，在缺乏強有力的思想理念以整合各地方派系的前提下，派系之間，誰也不服誰，主席一職只有虛銜、虛權，頂多用以調和各方意見擺平內部爭執。又由於任期只有一年，實際上變成「主席輪流做」，主席一職變成帶有酬庸及榮譽性質的一個職位。

黨主席這個職位如果淪落為輪流做的地步，只有兩種情況可以說明。一是這個職位不具關鍵性，任何人來做都一樣，另一種情況是，內部紛爭擺不平，只好以限制任期的方式，做到面面俱到，不使那一派人馬因擔任了主席而利用主席的職位擴充實力。

即將於二月成立的「立法院民主進步黨黨團」，其負責人也擬以「輪流做」的方式解決。因此，民進黨籍的立法委員只有區十三名，這個擬議中的黨團卻設置了「總召集人」、「副總召集人」，任期各為立法院一個會期的時間，另外還設立立法院民進黨黨團秘書處，置幹事長一人，任期一年。根據這項安排，區區十三名民進黨籍立委在今後三年內，每人至少可以擔任上述三種職位



中正機場外  
長達一公里  
的接機人群

之一種或兩種，充滿了輪流做的味道。

民進黨尚在草創階段，按理說，其領導作風必須開創性多於保守性。國民黨執政數十年，累積龐大的政治資源，各種行動只要做到「守成」，即可立於不敗之地，民進黨則無「成」可守，必須以強化領導層的能力為手段，才能打開局面，但是民進黨對於領導結構的安排，如前所述，着眼於如何擺平原有黨外各派系不同的要求，妥協性極強，表現出來的行動能力則成為「被動應付」而不能「主動出擊」。民進黨成立這四個月來，只是被動地應付外在的壓力，而不能主動因勢利導，開創局面，就是這種權力結構下的產物。以下一連串事件可資說明：

### 保守被動的態度

一、與海外支持者的關係，海外支持民主進步黨的勢力在民進黨剛成立時，自動組成「民主進步黨海外組織」，但民主進步黨中央卻時時採取拒斥的態度，主要原因是為了「應付」國民黨要求與「海外台獨劃清界限」的壓力，因而失去了與海外支持者形成「犄角」之勢的機會。直到去年十二月才組成四人小組，負責籌設海外黨部，等於是另起爐灶，平白失去了利用海外現成政治資源的機會。

二、接機事件。「民主進步黨海外組織」的代表許信良、謝聰敏、林水泉等三人率領「百人團」回台入黨。「百人團」其實只有六人，固然雷聲大雨點小，但是民進黨對於他們的「回台入黨」則絕口不提「入黨」的事，而把問題淡化為主張「海外同鄉返台權利」。民進黨前往機場接機的行動步

調不一致，這項行動演變成個別候選人作「選舉秀」，而發生所謂「機場滋擾事件」時，民進黨初步反應竟沒有自己主張，盲目附和國民黨的說法，也強調譴責暴力份子，沒有立即公佈誰是暴力事件的始作俑者。而當許多前往機場而個別遭警察毆打的民眾要求民進黨出面向警方或法院交涉時，民進黨竟推得一乾二淨。顯見民進黨不但未能事先（許信良等回台行動有五個月的醞釀時間）安排如何妥善利用海外支持者回台所造成的形勢，而且在被動應付時，亂成一團，幾乎被國民黨政府的治安單位導演成一場製造大逮捕藉口的苦肉計。

三、解嚴與國安法事件。國民黨政府在去年十月十五日民進黨成立大約兩週後，宣佈即將解除戒嚴並代之以國家安全法，其草案並於去年十二月廿





九日公佈。民進黨對這種攸關國家及人民權益的大事，竟只是零星地發表個人意見，難道民主進步黨對於民主國家立法程序全然陌生？民主進步黨標榜「民主」及「進步」，在碰到像國安法這樣牽涉廣泛的法律，正是表現其貫徹民主進步理念決心的時候。民進黨即使

沒有提出代表民主進步黨主張的替代草案，至步也應學習西方國家立法程序，主動舉辦國安法立法公聽會，邀請素有學養的專家及民衆公開討論，此舉雖不一定能影響國安法既定的內容，至少可以為以後遇有類似重大立法案件開創立法程序公開的先例。

## 罷選監委癱瘓黨中央

四、監委罷選風波。民進黨兩度決議全面罷選監察委員，在很短的時間內重視同樣的決議，一方面顯示擁有監委選舉投票權的民進黨省市議員未形成維護黨中央權威的共識，另一方面，民進黨中央顯然只做到黨章第十六條的制定黨政計劃，卻沒有執行能力。一月十日選舉監委那天，台北、霧峯及高雄均有抗議監委賄選的羣衆大會，但是台北市卻由無黨籍（事實上的黨外）市議員李定中及第一屆立法委員雷渝齊主持，而中部的霧峯與高雄則由個別民進黨省議員及立法委員主持，未見民進黨中央出面舉辦此類抗議活動。同時，民進黨中央明知部份省市議員反對罷選，卻未見採取細緻的說服行動，僅象徵性地派出幾名中常委進行了解，在黨中央權威未完全確立之前，只消極發佈命令，而未補以細緻的說服動作是不夠的。

## 只有消極性的民主

民進黨的組織採取民主方式運作，但是民主方式表達却側重消極式的民主，亦即，其組織及結構着眼於防止黨權集中於少數的中常委或黨主席身上。這其實只表達了一部份民主概念而已，若要貫徹以民主理念為結構的重心，還必須做到「授權的獨裁」。此即，採列

舉的方式，條陳中常會或黨主席的權限，在此權限範圍之內，給予中常會或黨主席以處理全權。因為它的獨裁是經過定期授權，並不會造成長期或終身集權的現象，而且這也比較合乎民主的理念。如此安排，黨的領導機構才能發揮主動出擊的功能。

另外，領導權之行使還須注意權力正當性（Legitimacy）的建立。現行黨章對於領導權只做了形式正當性的安排。黨章第八條規定，上級權力組織應由下級組織之代表組成。換句話說，上級領導人經由下級組織以定期、選舉的方式而取得在這段期間內領導權的正當性。但有了形式的正當性，還必須輔以實質的正當性，領導權才能夠有效的行使。

### 黨中央的領導權 缺乏實質正當性

以前舉的監委罷選決議為例，中常會具有形式上的正當性，有權可以做此決議，但在此時此地做此決議是否恰當，中常會並未提出具有說服力的理由，而在此之前，中常會也沒有時間及機會建立威望，用以證明其有能力做出正確的政策或決議，亦即其領導尚處於低程度的實質正當性，因而才在決議通過之後發生一連串風波

中常會，以二次同樣內容決議的方式來表示其行動的恰當，這還不能說其行動具有實質正當性，因為幾乎沒有人因中常會的決議而改變對罷選的態



度。由於反對或贊成的目的——他們都在反抗國民黨選罷法的限制連記制度，不同的是中常會主張以罷選為手段，而反對罷選的民進黨省市議員則認為，堅持參選，並以單記法投票才是反抗限制連記制度最有效的方法。兩者之間誰是誰非是一項現實並且牽涉到個別政治利益的問題，不是一紙命令所可解決。

### 應強化領導 並擴大民主基礎

民進黨中常會在行使領導權時，若考慮到領導權的實質正當性問題，監委罷選事件其實是它建立實質正當性的契機。假設中常會理解到問題不在於是否罷選（因為有沒有罷選只有象徵意義其結果並無不同），而只是中常會與具有投票權的民進黨一省兩市議員，如何對於現行體制下的監委選舉建立共識而已。共識的形成是一種過程，而中常會則是過程的

啓動者，應針對個別議員做細緻的說服或勸退的工作，或擴大談決的基礎，將罷選決議交由中執委會議，甚至臨時黨代表大會議決，其結果應更能反映黨內的多數意見，更可表現中常會運用領導權的智慧。現在，中常會刻板的行使領導權，事實上並未能改變個別議員對於罷選的立場，卻使黨內關係僵化，或兩極分化，對民進黨將來的發展並無任何助益。

總之，民進黨將中央領導權力分散並不是貫徹組織民主化的唯一方法，在一定的範圍內，授權黨主席或中常委獨裁並不違反民主理念，而中常委在獲得了形式領導權的正當性之後，還須努力建立其領導權的實質正當性，才能夠進行有效領導。罷選監委是一項殷鑑，日後碰到爭執性強烈的事題，如果能從領導權之實質正當性着眼考慮，當更有助於培養其組織韌性，有效地開展黨務。

● 參與手記 ●

# 我的脈搏與她

## ——談助選的一點心得

慈林教育基金會 典藏

/ 秀美

臺灣大學圖書館 數位化

選舉期間，每天背著一袋一袋的傳單，穿梭於台北大街小巷之間。做為這樣一個傳播者，其所面臨的挑戰相當強烈，有人拿著傳單當場把傳單撕掉；有人反應冷淡；有人撐起大姆指表示鼓勵，臉孔顯露出追求民主的意願。

我身為一個學生，因不願被矇蔽在僵化的教育體制之下，遂參與了民進黨的選舉活動。活動期間，內心充滿著挫折和矛盾交錯，朋友認定我是偏激份子，親人擔心學校教官會找麻煩。走在街頭，偶而遇到大陸來台的老兵，他們會喝住你立正站好，然後大聲叫罵「叛國賊」、「共產黨」、「娼妓」。面臨此種情況，淚與雨俱落，到底誰是真正的愛國者？是的，他們一早在中正紀念堂高唱愛國歌曲，他們可以利用龐大的新聞媒體，封殺反對者，可是我們的老師，明明白白教導民主政治的定義，就是要公平競爭，老師沒有錯，錯的是歷史悲劇下的台灣命運，閉鎖了許多人的胸襟。



話說白蛇娘娘為了要促銷許仙賣的解藥，於是魔法讓全城的人中毒，然後大賺一筆，白蛇娘娘笑說：「放毒的是我們家，解毒的也是我們家。」有位候選人的助講員以此故事，比喻戒嚴和解嚴。戒嚴了四十年的台灣，國民黨突然說要解嚴，令人懷疑他們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有一次，在一場私辦政見會上，二位行動極為神秘的人，悄悄地交給我一封信，叫我代轉給候選人，其內容是抗議不能和祖國親人通信，要候選人說出他們四十年的心聲。這種言論却被冠上「共匪」、「分歧分子」的罪名，然到底誰才應背負這種罪名？

我跑遍台北市各個區域，較低收入的中下階層，都把希望寄託於新黨，一向國民黨的作為是和既得利益者結合，加上濫用權力，黨國不分，一黨獨大，以很可懷疑的經濟「奇蹟」掩飾社會結構的混亂，他們可以在一夕之間搞掉好幾億台灣人民辛苦賺得的血汗錢，却從不



慈林教育基金會 典藏  
臺灣大學圖書館 數位化

低頭向人民道歉，難怪地震頻繁不斷，像是老天爺提出嚴重警告似的。

競選活動到了最後一週幾乎要沸騰了。迎接許信良的人群，手持鮮花，高吼「台灣要民主，我們要和平」，軍警方派出大批鎮暴部隊，石頭、噴水管、催淚瓦斯槍紛紛出籠，而幫閒的官方新聞媒體，把人民醜化為暴民。我們堅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不到最後失敗不輕言放棄，我們唯一的反擊方法是大量散發傳單，堅定的脚步，踏在台北的每個角落，感覺到真理正在敲播。選舉活動最後三天，軍方喊打喊殺，並稱要停掉選舉，而這三天，黑函滿天飛，賄選的消息不斷從選民裏頭傳出，真正製造政治污染的罪魁禍首，大家心裡都很明白是誰。

開票結果，國民黨仍以維持約百分之七十的得票率而洋洋自得，民進黨也很滿意其成績，大開慶功宴。選舉完畢，一切似乎歸於平靜

。然我的心中，有許多期許，政治絕非只是手段，滿足人民的需求，把社會導向健康，有文化素養的層面，才是正途。對於民進黨，除了鼓勵支持，也忍不住提出以下建議：做為一個反對黨，其包容性應儘量寬大，民進黨表現出的島國心態，令人誤解它具有排它性。無可否認，此次選舉中，民進黨帶動了群眾運動，但未來，我們不希望看到群眾被利用做箭靶。

此次經驗，令我學到寶貴的一課，回到清純的校園，却有無力之感，可愛的大學生，却喪失抗議精神，有很多學生，因不滿學校狀況而出來助選，隱約表現出反體制的心理，我們何嘗不希望好好讀書，但社會上到處充斥的不公不義和形形色色的污染，實在讓我們安不下心來讀書。

只要太陽仍舊照耀，只要島上的人們依然勤勞奮起，我的脈搏便會與她同步跳動。

# 日據時代的

大大小小的漢人學生在日本老師的淫威下靜默肅立



# 台灣學潮(上)

／ 林 滙



## 關於《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

這一部警察沿革誌，是日本帝國時代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的集體作業成品。雖然在體裁上是一種資料性實錄，但因為警察業務是殖民地統治的第一線，對現地社會生活的涵蓋面極廣，因此，它的史料價值不容忽略。其中第二篇的總題目是「領台後的治安狀況」，副題是「台灣社會運動史」。如此取名，在內容上並不踰越。本篇起自明治四十年代的台灣同化會，到昭和九年（一九三四年）的台灣右翼運動，前後歷三十年，所舉參考資料極為豐富，解析各種運動的文字也井然有序，且也充分表現出當年日帝時代警界菁英相當豐富的人文素養。

此書非一般問世的史料集，而正如其凡例中所言，編纂目的在於「供警察職員執務上之參考」，因而首重詳實。然究竟無法完全摒棄其統治者立場，對事件原由的剖析方面時而難免幾許掩護或扭曲，或受關係人物的證言或心性的影響，整體的客觀性還是不免一些瑕疵。

但即使如此，仍不失為研究台灣史者的珍貴的基本原始資料，尤其其系統性和整合性質不容置疑。筆者這一篇日治時代的台灣學潮，基本資料引自該沿革誌，只在有限的經緯細節上參考了當年直接或間接和實際情況有所關連者的口述，予以粗略整理，還請大方指正。

## 當年學潮的背景

近代資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教育，毫無例外都具有互相矛盾的雙重目的。一方面為了培養現地生產及行政方面的初級人才及基層人員做為殖民地「建設」的補助性人力，它必須把落後的現地住民教育成具有一定水平的、近代範式的行為能力者。為此目的，一定程度的生產科技教育和公民教育是不可缺少的。但另一方面，為了殖民支配制度的穩固，必須消除原住民的民族自覺，貶降原有文化價值，使現地人認同及誠服於殖民者，則又必要另行一套歪曲的人文教育或「精神」教育。

前項教育旨在「啓民」，後項則純屬「愚民」。也就是說，殖民者君臨其殖民地，必須一方面啓民，另一方面愚民。在理論上，一個殖民地教育當局，是不可能在這兩項不同的教育實施中有所偏廢的。尤其是如果因一時的功利主義，急圖殖民地經濟的効率化而偏重「啓民」教育，則受啓發的民智必然使反抗運動的方法論和工具大為進步，到頭來動搖其支配體制。只這一點，往往使殖民地教育變成了殖民地統治體制的軟腹地帶。而事實上，幾乎所有的近代殖民地反抗運動，都是以受過殖民地教育者為主要推動力，且往往以教育領域中的反歧視、反愚民口號為其啓端因素。

一九二一年十月間成立的台灣文化協會，在其籌備期間便以學校工作為一重點項目。當其創立大會在十七日於北市大稻埕辯修女學校召開之際，參加者以總督府醫學校、師範學校、商工學校、工業學校等校的學生為主。據當日記錄，學生與會者有：台北醫專學生四十九名、中央研究所農業部（後來的高等農林學校）三十名、台北師範一三六名、台北工專學校三名、台中商專學校六十一名，計達二百七十九名。嗣後以各校學生為基幹的演講會、讀書會、研究會等，為文化協會重點項目。自一九二三年起，在文協支援下，在各地先後成立的青年會計有：(1)台北青年會，由留學中國大陸的翁澤生主持。(2)美麗也會（基隆市），文協理事邱德金及會員吳金波主持。一九二六年成



立。(3)通宵青年會，一九二五年成立。(4)炎峯青年會，一九二四年成立。(5)大甲日新會，一九二六年成立。此外尚有台南的赤崁向上會，台南基督教青年會，彰化無產青年會等。這些青年組織平日都和會員出身學校的學生活動有所掛鈎。

自一九二〇年代起，島內中產以上的家庭子弟，到日本或中國大陸留學的人數日多，如日本留學生組織的新民會，東京台灣青年會等，都和島內中等以上學校的讀書運動保持著連繫，尤其大陸留學生的增多，使台灣學生對中國大陸的政治局勢及學生運動概況的知識日益廣泛，這些都帶給台灣島內學生學習上、運動上的刺激。這種趨勢，等到文化協會正式開始以後，受到更大的鼓勵。在台灣受到退學處分的激進學生，大都獲得協會的介紹和援助，由住在東京或上海廈門各地的同志照顧轉入當地學校繼續求學，並在求學中參加當地學生組織吸收各種時潮意識和運動經驗。這批台灣留學



這些由國語學校師範部畢業的學生是日人推行日語的工具

生，多利用假期回台之便帶回各種刊物及親身見聞，散布於島內學生界之間。

文化協會的學生會員數逐年增加，至一九二五年後已超過一千人，各學校中的運動風氣也逐漸轉盛，其中尤以台北師範學校最盛，中學則以台中一中因原係林獻堂等中部士紳鼎力促成創校的緣故，和文協關係特強。島內學生活動風氣的增高，引起了當局注意，各州警察課中的特高組（擔當思想運動）經常對各校暗中佈控，或對學校當局施行壓力，促其加強學生活動的管束。時值日本國內的學生運動也正急速膨脹中，左右兩翼思潮在社會運動中的衝突已經相當劇烈，由日本本土赴台灣任教的教員中，也不乏左右兩翼的同路者。這些因素一時使台灣的校園情勢日趨緊張，遂以一九二二年二月間引發的台北師範學校第一次騷擾事件為開端，連年在島內各地學校間發生過規模不一的學潮。這些學潮雖然每次都遭受到當局的嚴厲處分，學生們高張中的民族意識和運動意

惑却未曾被完全撲滅。每一次事件發生，都能獲得文化協會以及海外留學生團體的聲援支持，而變成了當時社會反抗運動中極富教育意義的一環。日後台灣社會運動中的不少鬥士，都是這一期間學生運動中脫穎而出者。現在把幾次比較突出的事件概要列記於后。

## 台北師範學校第一次騷擾事件

一九二二年（大正十一年）二月三日，台北市大稻埕新街派出所的巡查（警員），在指揮交通時呵責北師學生數人，態度凶蠻，口出惡言，當場便遭到學生們的頂撞和反詰。該巡查以恐嚇口氣逼問學生姓名，有人因恐懼而不敢報以真實姓名。學生們回宿舍後告訴大家說，巡查態度極為惡劣，且有「北師學生中多有不逞份子，一日將施以斷然處置」等語，學生們推測巡查口中的「不逞份子」指的是參加文協活動者，遂引發了憤慨和恐懼心理。繼而在二月五日下午，東門街派出所巡查粟山，對北師學生杜榮輝等數名通過派出所前道路之際，指責學生們故意違反交通規則，並厲言警告，學生們則反唇相譏殖民地警察之惡劣作風。

粟山巡查至同日下午六時交班後單身赴北師，向該校生徒監（今之訓導長）瀧田和三郎，一時喧嘩不已。舍監制止無效，學生們進而把學校大門關閉，聲言除非該巡查表明無意懲罰學生，將不予以放行。時學生聚集者達三百餘名。此時適有一消防隊員走過學校前面，目睹情況急報東門派出所，立刻由該派出所轉報南警察署，該署姉齒警部備帶一名刑事專務巡查急赴學校，時有學生六百餘人守住大門，阻斷道路，不讓進入校區，且有人投石。姉齒等控告該校學生屢次違反交通規則且侮辱警官，要求瀧田嚴厲處分惹事學生。舍中全體學生遂聚集於舍監室周圍，連聲抗議警察演暴侮辱學生，俟該巡查離開舍監室時將之包圍，或喊口號或責警察刻意羅織戴帽，多人趁勢踩響地板人強行入內，會見粟山巡查及瀧田生徒監，聽取情況報告後向學生提議解散，學生不聽，遂急報岡野署長。岡野帶三名特務巡查趕至，努



力懇陳說服，仍無效，直到總督府學務課長起來協助處理，向學生們保證，即使違反交通規則，處罰不過申斥罰金，警察如果侮辱了學生，還是會受譴責甚至免職，至於有人誤解警察要為難參加文協的學生，那是無根謠言云云，至此學生們始漸漸散去。

不料次日官方竟然發動司法權，一舉逮捕了台灣人學生四十五名，並於二月十六日及十八日兩天由檢察官提訊。被捕學生多為文化協會會員，平日積極參加該協會所主辦的各項活動，並在校內也有研究小組的組織。騷動當天這批學生並不會有過特別突出的煽動行為，可見其係根據警察手中的「黑名單」而逕行逮捕的。

事件後，文化協會立即與被捕學生的家長取得連繫，在其會報上提出緊急訴求，並向總督提議取消逮捕令，妥善處理。海外台灣留學生團體亦有聲援活動。總督府鑑於台灣人社會間的輿論反映劇烈，乃於二月二十一日，以起訴猶預釋放了該四十五名學生。然官方嗣後動員在台日人輿論，及部份親日派台人士紳，同聲斥責「學生背後之文化協會」，尤其台灣日日新報以長篇社論大舉攻擊文化協會，指其專志煽起民族反感，誤導未來負訓導責任之師範學生，釀成了如此嚴重的社會問題。

總督府學務課乃趁機下令各學校強迫各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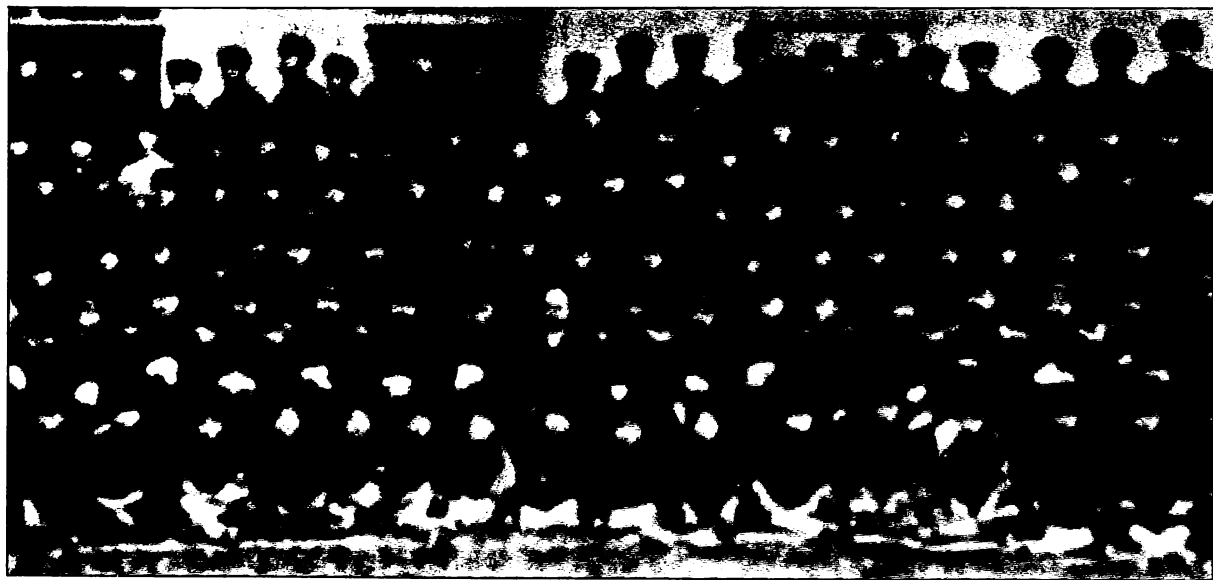
在學學生之參加文協者脫會。各校當局於此類施壓力，至五月間，部分學生及家長經不起恐嚇而申請脫離文協。計有：台北師範學生二百零五名、台中商業學生七十三名，而此一學生退會風氣竟然連帶影響了普通會員，新竹州三十三名，台中州六十五名，台南州十二名。可見當時文協初建，思想與紀律教育仍未上軌，致有此一挫折。但當總督府官員慶幸這種「塞翁失馬」式的「勝利」的時候，受挫的學生們却義憤難平，而官方的詭詐作風，却已種下了另一次爆發的火苗。

## 台北師範學校第二次騷擾事件

一九二二年第一次事件過後，多數學生雖然在校方壓力下退出了文化協會，然不平之氣一時瀰漫於全校台灣人學生之間。警方亦風聞台灣人學生間的「民族反感」仍甚濃厚，而寄以密切注意。嗣後校內經常發生日本人與台灣人學生之間的各種糾紛，而校方仍以抑壓台灣人學生的「不逞氣焰」為處分原則，致使台灣人學生每受委屈。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學校按往年舊例，計劃寒假修業旅行。時不久前台灣人學生與日本人學生之間因敬禮問題而發生過爭執，校方的處理明顯地偏向日本學生，致使台灣人學生多

日據時代搞學潮的很多是中學生



人連名向校方提出過抗議書。此事剛成過去，有關旅行目的地的意見又在兩派學生之間形成了對立。日人學生主張到宜蘭地方，而台灣人學生則希望一次南部旅行，在人數上日人學生雖然是少數，而校方却採納其意見，決定了宜蘭旅行計劃。校方且把表示反對態度的台灣人學生逐一召來以恐嚇性口氣詰問因何反對學校計劃，有一位學生名叫許吉者，答以「非有意反對學校命令，只是不願意服從舍監個人的命令」被認為態度不遜，受命謹慎（等於禁止令）。台灣人學生對此大表憤慨，皆認為日人以少數壓多數的決定已是不公，「我們台灣人連表示反對意見都要受罰嗎？」眾人建議許吉不要接受如此無理的處分。

到了十一月十八日，亦即計劃中出發旅行的當天，台灣人學生多數決定起床時間不起床，不參加旅行，採共同行動者達一百二十三名。入夜，抗議學生聚集在舍監室教員室周圍喧嘩，且與校方職員爭辯中有人投石。騷動逐漸擴及全校各年級學生。到了二十日，校方終於宣布休校一周。在休校期間學生們離開宿舍回家，文化協會緊急指派蔣渭水等幹部多人和學生中積極份子商議。在休校期限的最後一天，亦即十一月二十六日，向在家學生們發出「犧牲者衆，勿歸校」的電報，並進一步散布攻擊當局歧視台灣人學生的傳單，呼籲在當局未改善對台歧視政策以前共同抵制復校。

校當局至此感到事端已有趨向組織性爭議的可能，乃企圖在學生之間進行分化。一方面對於復校後準備加以處分的學生發出通知，囑其未接進一步通知前不必復校；另一方面對其餘學生則命令其於二十九日起歸校上課。受到暫不必復校通知的學生們，立刻與文化協會取得連繫，在後者的支援下向全體台灣人學生發出「寧死不歸校，我們有辦法」的電報，由其中積極分子巡迴各地勸告學友，且派出糾察隊分赴台北車站及其他交通要道阻止學友回校。台中、彰化、大甲等地的學生全體接受勸告無一人歸校。文化協會彰化支部支持學生家長召開大會，發表聲明繼續攻擊校方的處理方式。校方因鑑於三年前第一次事件時無人被退學，才使學生「不知利害，如此猖獗」，爲了貫徹

目的，遂採行強硬政策，發表卅八名名單「予以退學處分」。此一空前的集體退學處分，雖然引來了輿論與家長會的激烈抗議和攻擊，只因當年投考師範學校者多屬清寒家庭子弟，一身進退立刻影響家庭未來的生計，其餘學生及家長因而下得不隱忍一時，陸續回校。

至此，台北師範學校第二次學潮，以卅八名的犧牲而落幕。但這一批被趕出校門的師範生，後來多人在文協的安排下分赴東京和中國大陸繼續求學，日後台灣社會運動中的不少鬥士，都是這批北師學生出身者。

## 台北商工學校罷課事件

一九二六年十月七日，台北商工學校學生陳清池等八名在台北市建成町澡堂大和屋和一名日本人濫川久吉發生語言衝突，繼而打鬥，濫川負傷，學生們當場被警方逮捕。檢察官將一千人起訴，至十月二十三日，陳清池、王沃金、蔡定國三人遂被判勞役四個月，以緩刑被釋回。此一事件，雖然根據目擊者的證言，可以斷定起因於日人濫川的態度傲慢，言辭中多有侮辱台灣人的用詞，挑起了陳清池等學生們的憤怒而雙方大打出手，却以「台灣人學生無理取鬧」爲由被判有罪。陳清池等被捕後警方懷疑其和文化協會有關，乃向校方詢取學生們的考核資料，校方竟然向警方提供不實的記錄誣指該「惹事」學生全部都是品行不良學課低等者。校方此一舉措，其用意實與替濫川驗傷的日人相同，目的在於將這批膽敢打傷日本人的台灣學生入罪。

陳清池等被釋回來後向家人及同學訴說「因爲我們是台灣人，有理也變成無理，官方且故意把事態小題大做」，及其知悉校方在其被捕後不但不出面援救，反而把不實的考核資料提供警方形似落井下石，憤慨不已，遂向文化協會訴求支持，該協會乃經調查確知校方的荒誕作法後協助該批學生們印發傳單呼籲全校台灣人學生一同抗議校方以卑劣手段打擊本校台灣人學生。校方因理屈無法向學生解釋，只有抹殺學生要求以拖延時日，學生們遂發動了十天的同盟罷課。

（待續）

●現場報告●

# 一七一五報告

## ——揭開人性屠場真相

/ 姚國建

姚國建被扣上手銬



## 前言

一九八六年六月十七日十五時卅分，在朋友陪同下，我踏入國民黨政府的司法機構——高雄地檢處執行股，接受這個組織給予的兩次侮辱，當天十七時十五分我與一群犯人搭乘同車取道高速公路，到達位於高雄縣燕巢鄉清水坑新建啟用的高雄看守所。似乎為了提醒我對這個時間的記憶，入所二週後，我的編號恰好是一七一五，在以後的四個月中，我的名字一直叫一七一五。為了完整記錄這四個月的所見所聞，我將做如下報告，為了永遠不忘身為國民黨政府人質的一份子，所以我就叫我的番號「一七一五」做為整個報告總稱。

讓我們先由國民黨的法治神話談起，筆者不擬以過多的贅言，引述國民黨法律的本質，就以一個「一七一五」犯人的身份談談所謂「監獄行刑法」及其他相關法規。

### 看守所不敢拒收瘋人犯

國民黨政府在一九三五年公佈了刑法，一九四八年以後，國民黨政府發覺刑法不夠嚴峻，因此，以實施戒嚴令的名義，將刑法弄得支離破碎，一下子軍法、一下子戡亂時期、一下子……，以苛法擾民，却將苛法之所以會產生的罪責歸之於「萬惡的共產黨」。弄了那麼多「法」，當然要「生產」不少犯人。生產犯人的法律有「刑事訴訟法」及羈押法等。

依據刑法第十九條規定：「心神喪失人之行為不罰、精神耗弱之行為得減輕其刑。」

羈押法第七條之一對類似症狀也明定應以容於病室、或隔離或護送醫院。

監獄行刑法第十一條更明定對於這類的犯人得拒絕收監。

筆者在高雄看守所的愛舍囚禁四個月中，至少看過兩件以上的案例，有類似情形却依然遭受羈押，無法療病、維持健康。

其中之一的當事人名叫許×成，是高雄縣路竹鄉龍發堂的精神病患，有高雄醫學院出具

的完整病歷證明，許某在龍發堂治療時期，因病發作，將另一病患打死，致被送到高雄地檢處偵辦；檢察官以殺人罪將之起訴，法官照樣以殺人罪來問案。許某由於病情的關係在法庭上根本無法對自己行為提出說明，只有癡呆任由檢察官或法官自談自話；誠然，偵辦本案的司法人員其輕鬆是可想而知，罪證明確，當事人「默認」，剩下只是文書製作而已。然而，我們不禁要質問檢察官及法官「大人」以下兩點：

一許某的精神病症狀已經醫院確認，該兩位「大人」難道是精神病專家，竟然可以由精神病患口中問出「清醒」語言？

二高雄看守所並未具備容納精神病患之條件、也無精神病患之診療設備，請問兩位「大人」，如此羈押對法律權威的考驗是否有正面價值。

高雄看守所於一九八六年五月四日啟用，許×成由於病情嚴重，本身連盥洗能力都沒有，由於長期隔離獨居，又沒洗澡，週身一股難聞之氣味，影響看守所環境衛生。據看守所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高階人士表示，依法看守所是可以拒收這類人犯，然而由於看守所本身，尚受到檢察處轄制，沒有人有膽做出拒收的執法勇氣。

許×成一介心神喪失之人，家人避之、社會漠之、法律更不是他的保護者，只有在茫然中接受惡劣的環境、飽受惡劣衛生條件侵擾，步向毀滅。

許×成的羈押顯示出國民黨政府的司法單位，喊了好幾年的「莫濫押人犯」口號，根本是一齣荒唐的鬧劇。依據高雄看守所的資料，未遷入新所之時，舊所收押人犯最多為六百多名左右，去年五月四日高雄看守所搬至目前地址，到了十月份所內人數已超過二千一百人，增加了三倍。扣除代監執行約一千二百多人，單僅羈押被告人數便達九百人以上，其中重刑犯（亦即刑事訴訟法七十六條所規定之所犯最輕本刑五年以上者）五十多人，其餘多為檢察官或法官認定合於刑事訴訟法七十六條第二項所認定有：逃亡或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者。

實際的情形是，並不是所有重刑犯都予以羈押。轟動一時的高雄市警察局刑警左高峯貪污案，由高雄地院刑庭判刑十三年，依法是重刑犯，却獲交保釋放。交保的理由是生病，但以他的體力，普通一、二人還近不了身，法院却說他生命有危險，報紙又說他在看守所意圖自殺。不巧的是，筆者入所所居恰為其前居之舍——愛二舍，據主管人員表示，左某居住一號囚房，從未聞其有自殺之情，也沒有任何人對其威脅或辱罵。有趣的是許×成所居也是該房，兩人待遇却天壤之別。一向「忠黨愛國」的左某岳父高雄市議員賢繼禹，突然在四月份的一次市議會議期，在議會炮轟市府圖利調查局高雄調查處，左某在賢議員的質詞後，於五月六日交保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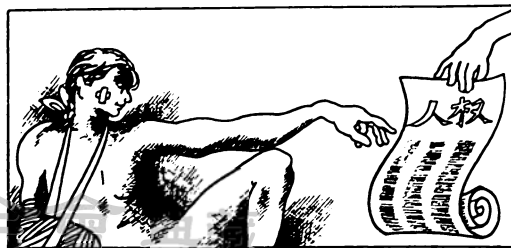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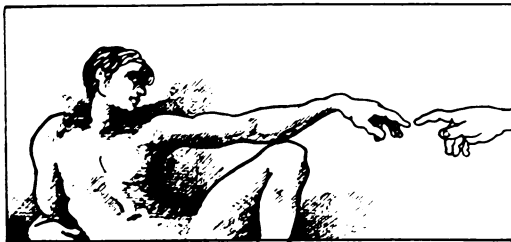
由上述兩件案子的強烈對比及羈押人犯的比例、原因，我們可以看出，國民黨政府所謂「莫濫押」尊重人權的指示是一項法律神話。

## 不通節沒得飯吃

水滸傳裏描述，犯人到庭，無論有罪無罪，均先由皂隸痛打一百棒，名為「殺威棒」，其對犯人之虐待，即使在現代亦會不寒而慄。國民黨政府對於實行民主、尊重人權、信誓旦旦，但現代法庭對於人犯之虐待與古時皂隸相差不多。筆者便親眼看到高雄地方法院之法警數人連續凌虐犯人之實況，現詳述如後。

由於羈押場所——高雄看守所位於燕巢；人犯出庭來回費時，因此，提解人犯需費時一整天。也就是說早晨提出，到傍晚才還押，中午飯就在地院羈押室食用。不少被告之親屬為關心親人之飲食，在中午皆有購買一些食物送入羈押室，或於被告出庭時就便遞送。但是，被告有時候順利收到親屬送的食物，也有時候送進去的食物被法警擅自扔掉。據了解，有些被告之所以能夠收到食物是因為對法警意思意思，若沒有先打通關節，送進去的食物一律遭棄置。

筆者是日中午之餐食，亦係家人於出庭之際遞交，未料候審室的法警竟然以「違禁品」之名義，強予奪走，筆者向其力爭，並要求提



出依據甚麼理由取走被告財物；法警具此狀況，竟然以「拖曳」之方式，強將筆者拖至辦公室，副法警長當場對筆者表示：

「這裡的規矩是由我們來訂，告訴你，我們是法院的人，就算對你怎樣，也沒關係，你也沒辦法告。」

如此，堂而皇之之拿走筆者原子筆一支、食物兩片、十行紙、狀紙一張，更當面將筆者之食物打開分嗜，當筆者向他們抗議，他們嘻皮笑臉說是依規定檢查。

整個過程顯示出了「衙門皂役」之惡行，法院之法警尚且如此，法院以外的人可想而知。而且，法警提押人犯的方式純依照法警的喜惡，有的被告可前銬，有的被告雙手反銬（筆者便是），（依法被告在法庭上身體不得拘束）法官更視而未見，所謂法治直如廿世紀之神話。

## 看守所濫施腳鐐戒具

不僅如此，看守所對於涉嫌重罪之被告一律施以腳鐐戒具，但奇怪的是所謂重刑犯施用戒具的對象却未包括貪污犯。這些所謂重刑犯未經起訴便已施加腳鐐，初入所之重刑犯不少人腳踝受戒具磨擦皮開肉綻；為「重刑犯」喊話是一樁不討好的差事，因此多年來也沒人提起，然而人是否有罪，筆者以為應依法定之，是否該施掛戒具更應依法行之。地院判處無期或死刑之被告，施以戒具固為見仁見智之問題，筆者不擬在此爭論，然而地院對於尚未判罪，便「強測」是重刑犯而濫施戒具，則大有不該。

一九八六年初鼓山分局逮捕一位搶劫嫌犯，後經查證此人是冤枉的，但法院及看守所，

竟然在其一入看守所便施以重戒具。試問，此種行為是否構成公務員濫法？更有甚者是法院竟堂而皇之，容許戒具施加進入法庭。

刑事訴訟法二百八十二條明文規定，被告出庭時不得拘束其身體，但得命人看守。請問：法官、檢察官是瞎子、聾子？被告站在庭下被拘束身體竟然視而不見。

羈押法第五條明定，被告非有事實足認有暴行、逃亡或自殺之虞者，不得施用戒具……。

監獄刑法第二十二條亦有類似規定。無如這些法條完全未見執行。筆者曾就此一情形請教一位司法人員，你猜他怎麼回答，他兩眼一翻答：

「我們已夠民主啦！你去過警總，你該知道他們的那套，有時看戲不要太挑眼。」

哦！有個警總弄在前面，難怪這些「小法院老弟」有樣學樣。

警察打人！



## 巧立名目附加刑罰

國民黨政府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九日公佈的監獄行刑法第一條明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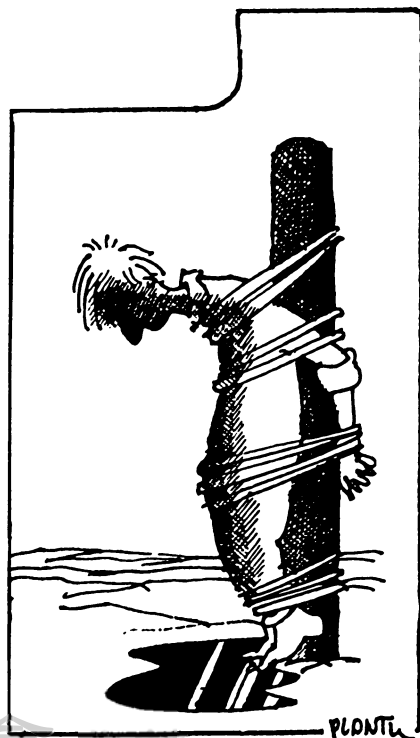
徒刑、拘役之執行，以使受刑人改悔向上，適於社會生活為目的。

令人覺得好笑的是，國民黨在監獄行刑法廿條便發生了與第一條有顯然的矛盾情形。第一條的精神是「有教無類」，以使所有受刑人只要改悔向上、適應社會生活為目的，而第廿條却對於何種受刑人有「資格」接受及享受改悔向上訂出了條件，它是這樣記載的：

對於刑期一年以上之受刑人，為促其改悔向上，適於社會生活，應分為數個階段，以累進方法處遇之……不為累進處遇之受刑人，能遵守紀律，保持善行時，仍得依命令所定和緩其處遇。

注意後段所玩弄的文字遊戲，其中「仍得依……」所謂「得」並未有強制性，也就是說表現好執行單位並不一定對你和緩處遇，更可鄙的是這項條文根本未定如何和緩，時限若干。以監獄行刑法第廿條來看，是否表示，一年以下之受刑人必改悔向上？若此，第一條的規定不過是脫褲子放屁一多此一舉。

國民黨的行刑制度對於普通刑事犯如殺人、強姦……者的確有應用累進處遇制度，然而對事涉政治案件之受刑人不是諸多刁難便是根本不適用累進處遇制度；貪污犯依戡亂時期貪污治罪條例第十八條規定不適用刑法之假釋規定，但國民黨當局懲治貪污並不如想像的嚴厲，它為貪污犯另闢方便門——外役監的辦法，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貪污犯全收容在外役監，外役監之受刑人由四級開始每月縮短刑期二日，三、二級縮短之刑期為普通受刑人之兩倍，一級更達近三倍，更可以放假、探親……，前述高雄市刑警左高峯判刑十三年，在外役監執行約六年多便可自由，這是完整的自由，沒有所謂假釋的約束。當然，無期徒刑便無法享受這種待遇，可是膾炙人口的前人事務局局長王正宜貪污罪判無期徒刑，入獄不到幾天竟然交保，據說此人目前不在台灣。這又是特權作祟，執法不公又一案例。



監、所之人犯，失去自由固為咎由自取，然而所謂受刑應受法定之刑，但實際上，監、所單位往往巧立名目附加各種刑於人犯之身。譬如說，監、所規定人犯新收或出庭回來應詳加搜身，有貴重物品應交付保管；但幾乎所有的監、所都有這麼一條規定：

凡貴重物品及現金，應一律交付保管，否則一經查出即予沒入，並以違規論處。

貴重物品妥慎保管，自有其道理，然而若以不交出即予沒入，並以違規論處，似嫌太目無法紀。刑法第卅八條就沒收之定義規定，一違禁物，二供犯罪所用或供犯罪預備之用，三因犯罪所得物。

依刑法卅八條所定之處分，依法應宣告並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七十條由檢察官命令執行之。不知何時開始，監、所管理人員身兼檢察官、法官於一身，並且竟然公然以文字在監、所內張貼，視為理所當然，並以違規論處，所謂論處通常是體罰行之，如打腳心、銬腳鏈等等。

所有之處分之法定方式（指釘鐐、上銬、綁縛）全未依法立即報告看守所所長、呈報法

院或檢察官核准，而是率性而為，更遑論甚麼「……並不得超過必要之程度。」其他私設之刑罰方式更多不勝枚舉，此種法外「刑」，在今日的監、所已不是甚麼新鮮事。

更有甚者，監所不知那個「天才」想出的餿主意，他們規定掛腳鍊者走路腳鍊不得有聲音、不准用腳鍊布保護腳裸骨、也不准用繩子牽引腳鍊鍊，必須俯身彎腰像猴子走路一樣，用手拉起腳鍊鍊以免發出聲音驚擾了「大人」（人犯對主管的稱呼）；如此把人硬當猴子，對於統治者的虛榮便可滿足了嗎？法務部長也好，司法院長也罷，除了用盡心機整人以取悅主子之外，不知到底對於人性的建設做了甚麼貢獻。

## 禁止接見掩蓋體罰

一九四六年國民黨公佈的監獄行刑法第六十二條規定，受刑人之接見及發受書信，以最近親屬為限。但有特別理由時得許其他之人接見及發受書信。

後面這段但書便是國民黨方便玩法弄權者之用，通常標準都以前者為準。同法六十三條規定，接見除另有規定外，每星期一次，其接見時間以三十分鐘為限。前項規定之次數及時間，有必要時得增加或延長之。依六十三條的精神，我們可以看出來，受刑人接見之時間最少不得低於三十分鐘，有必要時得延長之。可是全台灣有那一個監、所有確實執行這規定？坦言之，能夠給個十分鐘的接見時間便已是天大恩賜，無故剝削合法的人性交流，其心可憎，其行可誅，監督單位更有枉縱之嫌。

有關處罰之規定，監獄行刑法七十六條第二項規定，得停止接見一次至三次。這一項規定惡劣至極。首先，站在人道立場，不管當事人如何壞，處罰方式千百種，但以「箝制親情」做為報復工具，波及無辜（按：外面接見之人無罪），為主張人道主義者所不恥。據了解，這項禁止接見一至三次的規定，不過是為監、所虐待人犯，施以體罰之後，第一步安全措施便是禁止接見，等到傷癒後，在沒有留下任何虐待證據狀況下，才准接見。試想，在有技

術體罰下造成的傷，經過一個月早就消失。屆時即使想提起告訴也無從告起。

關於面談通信，監、所自己訂的「法外刑」規定，信紙不得超過兩張、字不得超過五百字（警總規定不能超過兩百字），而且監、所方有任意增、刪的權力。據資深的監、所人員透露，這種箝制主要是向老大哥——警總學的。書信是語言的延伸，它可以彌補感情無法及達之處、它更是一種舒解鬱悶的良劑，如果一個真正把人當人看的政府，對受刑人寫信給親友，鼓勵尚且不及，哪還會缺德地規定僅限二張紙，每張五百字呢。

## 執法僵硬違背人性

一九八六年八月十四日中央日報第七版刊載一則新聞說，女子劉思玉為探望在監男友，由於法令上規定不是親屬不能接見，劉女迫不得已，偽造一份結婚證書，以圖能見到心愛的人，却沒想到因此吃上偽造文書罪。從這則報導可以看出，劉女一非出於惡意，二是為了相思難忍，才不惜謊報結婚，三可見劉女至愛其男友。可是不論劉女如何無辜，在法官僵硬的執法態度下却成為可憐的犧牲品。

老黃是一名退伍軍人，在台子然一人。最近因為細故與人發生爭執憤而傷人，被扣押在看守所。老黃不懂法律，想要找朋友幫忙，但依規定非親屬不能接見，因此老黃在無奈下，面對深奧的法律被判七年有期徒刑。試問：是甚麼原因使老黃無法與朋友見面，求得幫助？

小宋犯法之後，家人對其誤解至深，在看守所情緒表現十分不穩。其朋友林某在公家機構服務，得知小宋情形，利用時間到看守所探視小宋，給予精神安慰，孰料礙於非親屬不能接見的規定，小宋與家人關係的僵化也一直持續下去。

「非親屬不得接見」的立法精神何在？難道是不准交朋友？若說深怕歹友接觸難收化莠為良之效，但也不應以禁止所有朋友接見為理，避免受刑人與歹友接觸可由教化、考核……其他千百種方式着手防止，任何人都有好友、歹友，豈能就此一竿打盡。



國民黨常常自詡承繼五千年中華文化，是的！中華民族「好像」有這麼久的文化，但看起來國民黨發揚的「文化」也沒甚麼人性內涵嘛。

監獄行刑法自公佈迄今已四十年，四十年前的標準是否合於現在的環境？實殊堪斟酌。再則，法律由某種角度可說是政府與人民之間的契約關係，違背契約是背信的行為，一個背信達四十年的政府能獲得人民多少的信賴？

## 檢查肛門污辱尊嚴

另外，監、所本身制定的「法外刑」，已成為「形同」監、所的內規，像對人犯身體的虐待等，受刑人懼於淫威也未敢有所異議，反而成為正常了。茲就兩件「小」事情，一是規定和管理人員談話要蹲着，一是檢查身體包括肛門，說明法外刑之酷虐。

監、所規定，人犯與管理人員談話，一定要「蹲」着，這種規定莫名其妙，唯一的解釋大概是表示管理人員高高在上的權威，而且也使於攻擊（蹲着的人很難阻擋來自各方向的攻

擊）。遠在蠻荒時代，部落間戰爭戰勝者對俘虜第一個「下馬威」，便是命令被俘者集中並蹲下。這種刑罰是否宜於容其長久存在下去？

另一種眾所週知的虐待是檢查肛門。依「規定」，人犯入所或出庭回來必須檢查身體。監、所對於出入人犯予以檢查身體有其必要性，然而檢查的項目之一為肛門檢查，其是否有必要，就有疑問了。檢查肛門最通常的方式是叫受檢查者面向後，褲子脫掉，兩腳分叉屁股厥起，以兩手將臀部分開，而主管則在旁高喊「蹲低些，再低，扒開，大一點……。」

運氣好的人犯這樣就算結束，碰到捉狹的檢查人員便故意拖延時間。筆者親眼看到有一次，兩個檢查人員故意叫一位受檢者扒開肛門，兩個人却望著受檢者肛門發出淫邪的笑聲，受檢人犯再屈辱也不敢吭聲。這種對一個正常心理健康之人無疑傷害至鉅，但是否真能達到檢查目的？

筆者呼籲國民黨當局，人犯在監牢裏受侮辱已夠多，拜託多少為自己同胞留一點自尊，對被羈押人犯凌辱至極，並不一定對統治權威的豎立有肯定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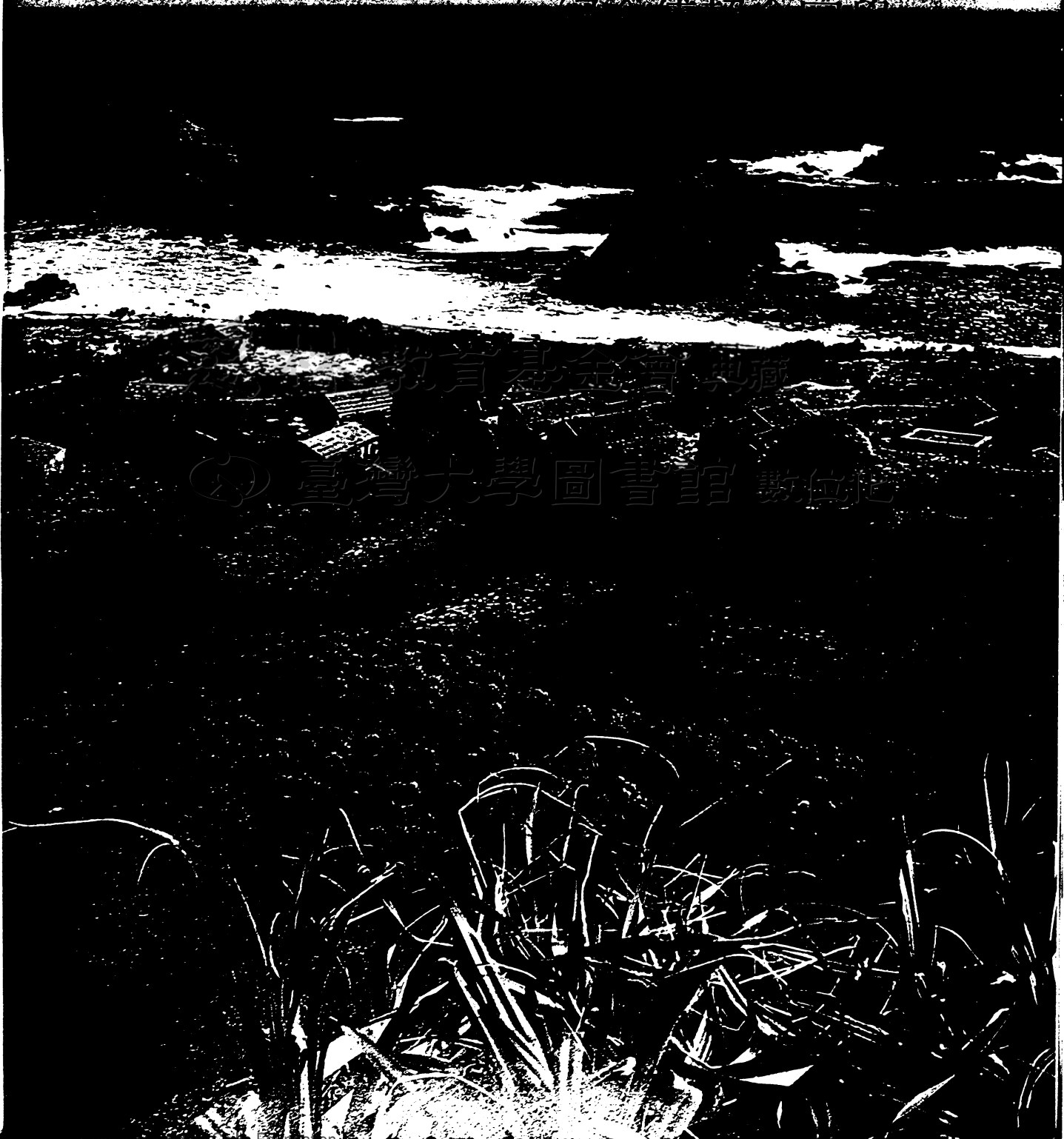
臺灣大學圖書館 數位化



全世界的獨裁者都有黑牢

● 藝 文 ●

# 鬥士鬥病死而後已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典藏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數位化

民國七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傅賴會兄病歿於台大醫院，行年六十二歲。我們這些當年喝過流澀溝水、沐過公館鷺風，曾被呼為「新生」而「修業」年限一般都在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上的綠島歸來人，又失去了一位生性溫良，做事却活潑積極的風雨故人了。

賴會兄台北市人，畢業於日據時代的台北工專學校（今國立台北工專前身），專攻鑛冶，本行的造詣相當好。因為他無論學習上、做事上都很認真，講求實際注重效率，很能把自己訓練成一位深具實力的技術工作者。他的這種優秀條件，使他從綠島回來後不久便在一家外資工廠得到了一個位置，專業能力再加上做人方面的厚重篤實，人望自然很好，雖然在資歷上背負著十年斷層的不利條件，還能迭受經營者的器重，終於獲升為廠長，先後十數年，據說在生產線上的建樹很多。

但在我們這些當年的「新生同學」之間，他所受的敬愛，和他的職業成就無關。大家只是喜歡他的明朗穩重的個性和誠實的待人作風。和他交談，只聽他台灣、日語、國語混雜無礙的一連「妙語」，幽默風趣，但該認真的時候却也不失中肯，條理分明充分表現出一位技術工作者應有的邏輯嚴謹性。這些都是他不論聊天或是談論，都同樣受人歡迎的地方。

大約在八年前，也許是早年綠島時代的艱苦生活——過度的勞動和極壞的伙食，多年間很少能吃到正常品質的米麵，大都是倉底清出來的發霉變味品——的後遺症，以及主持工廠的種種辛勞——外資企業雇用的現地廠長，其有形無形的難處一定很多，他覺得身體出了問題，似乎出現了一些症候。本來，他那科學頭腦，是不會毫無根據的杞人憂天，自尋煩惱的。只因為當年在綠島，常吃霉味很重的大米和麵粉，雖然當時沒人聽說過「黃麴毒素」這種名詞，後來當報上出現這個字眼時，專家們的說法的確使我們這批吃發霉米麵渡過一段時日的老「新生」，頓時心生警惕。也許他的自覺症狀令他懷疑，於是他前往日本，接受了身體檢查。（他有一位胞兄乃旅日外科醫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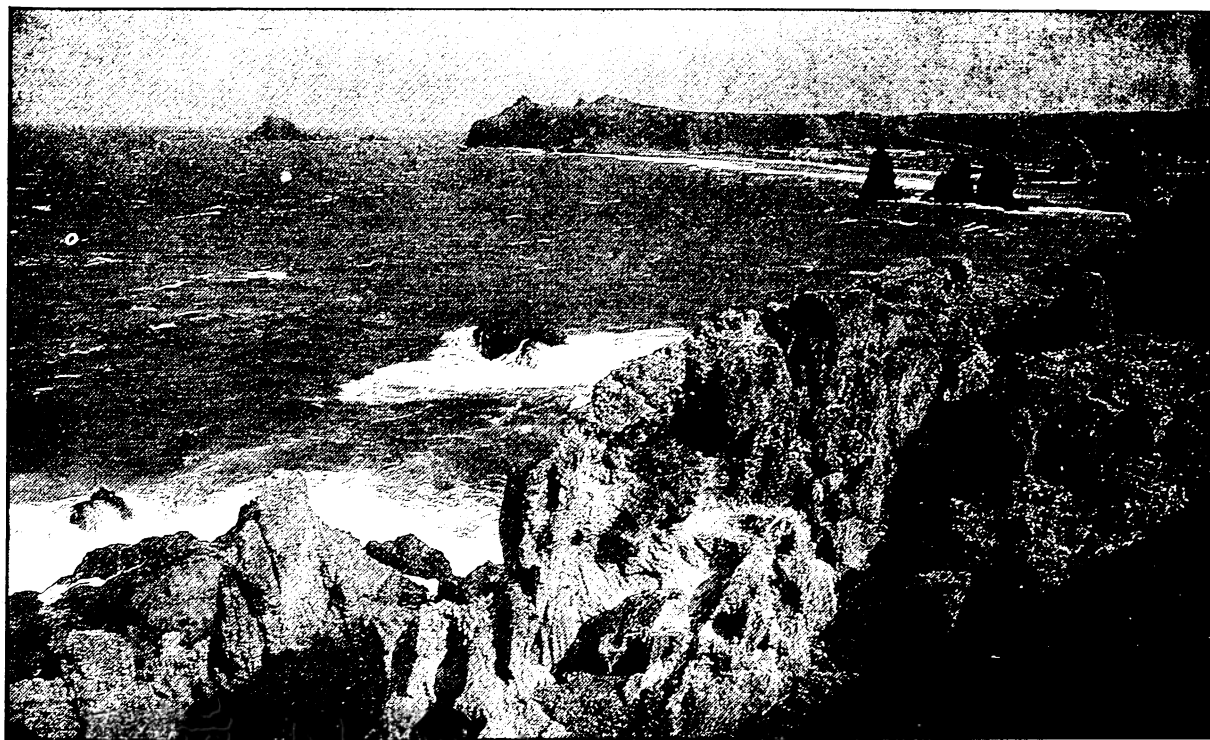
鬥士傅賴會

那位負責檢查的日本醫生，其醫術和醫德，於今想來好像有點撲朔迷離。據說在檢查結束後告訴他，正確的病名尚無法明告。我們不知道那位醫生在無法確定病名的情況下，曾經對他提供了多少病情方面的解述。但除了病名無可奉告外，醫生却提出了可能令受檢者遭到衝擊的建議，他說：你回去台灣後，最好馬上投保最高額的人壽保險。

這樣的一句話，小學生都猜得出，言外之意是餘日無多。我們也不知道那個日本醫生當時是以什麼樣的態度、口氣、表情，說出了這樣令人心緒不寧的忠告。但可以確定的是，賴會兄在宣告惡訊的異國醫師面前，絕不致於驚慌失措，他一定是以他那飽經風霜的老鬥士的坦然態度，接受對方那種也許是嚴酷也許是憐憫的眼光。即使有所質疑，也一定不會失去他慣常的那份冷靜。

回台後，他把上述的經緯告訴友好，根據其中一位的回憶，賴會兄很平靜地說，「生命離不開戰鬥，生老病死，也是生命歷程中的戰鬥環節，我將戰到最後一刻！」

筆者記憶所及，賴會兄雖也具有人文方面的修養，却平常很少特意談到帶有哲理的人生觀或生命觀。但他這一句簡短的話，實在涵有嚴肅的寓意，令我們這些歷遇相同、年歲相若的老友們感慨不已。



珠島風光

## 慈林教育基金會 典藏

他有技術者的緻密心思。對自己的病，像對一部機器的故障，只用客觀的檢查和細心的維修，別無多餘的情緒干擾。然而他也並不銜斷，原則上仍然遵守醫生的勸告，也試服過一些不同的藥物。（醫生和他都傾向於認定毛病出在腎臟）如果說在他的自行療養中還有一份獨家見解，那便是對運動克病功能的信心。但即使在這方面也是有節制的。不論登山游泳（這是他生平所好），都是持之有恒而不過份。從不急躁到疲乏不堪的地步。我們都感覺出他的運動的確克服了不少病情，像，臉色好多了，動作顯得更更有活力等。

醫生們幾次仔細的查看過，時而搖頭表示不解，但對病情的顯著進步，則不得不承認。但賴會兄本人却對自己的病情改善，只表示謹慎的樂觀。他是不相信舉不出理由的奇蹟的。雖然把日本醫生當年的診斷錯誤可能性也考慮到，却也不敢大意假定病已完全消除。不過只要自己覺得還頂得住，他的運動日課是不會停斷的。就在去歲，他再度赴日，攀登了日本第一高峰的富士山，不久又以三天時間爬了一趟

秀姑巒山。我們都以慶幸的心情聽取這些消息。爬山游泳，都是消耗相當體力的運動，一位帶病老翁，竟能一而再地完成了如此壯舉，我們都覺得他的運動治病論能在他本人身上得到了證明。但他本人却說，「我不敢說我的病已經痊癒了，我只不過想證明一下，帶著病做過度的運動，可能比完全不運動，在療養效果上好一點。」可以說，他對運動效果的看法也是持平的，倒沒有過份的迷信它。至於在其他方面的生活情形，也是十分簡單而有規律。三年前從職位退下來後，看書散步，定時登山游泳，偶而赴朋友宴席，酒量也是一定的，酒後健談，也一如往昔。逐漸地，有些朋友幾乎要把他幾年前被宣告為餘日無多的那一樁事給淡忘了，比較謹慎的也開始懷疑當年在日檢查的結果是否誤斷。反而他本人不敢那麼肯定，說「也許這是病情的抑制期」。即使只是抑制，八年來沒有惡化是事實，已足以部份地證明了運動的效果吧，大家都這樣想。

就這樣，樂觀的氣氛逐漸濃化在一些親朋之間，却不料在歲尾臨近的十二月初，賴會兄



一日發現自己的眼球泛黃，立即住進台大醫院檢查，而醫生又再一次無法確切地說出毛病在那裏。後來偶然間在醫院走廊上遇到從前看過他病的一位老醫生，聽取了賴會兄的一些自覺症狀後臨時替他再做一次檢查，這才發現胰臟上的腫瘤已大到壓迫胆道，使胆汁分泌受阻。更糟的是，要進行穿刺檢查時，由一位年輕醫生動手，連做十幾次都穿不到目標，在這中間，病人的痛苦可以想像得到。許是因為這最後的一段折磨，他的病情急遽地惡化了。被送進

加護病房，靠氧氣罩呼吸，口腔鼻孔出血，意識也陷入模糊，前後不出數天，終於在昏迷中斷了氣。

消息使大家一時間茫然不知所以然。怎麼短短兩旬之間，便有了這樣劇烈轉變？難道八年來被賴會兄的強烈意志力所抑阻的病變作用，終於衝破了他的抵抗而大事肆虐？

我們在哀傷中，另有一種無法釋然的疑念。究竟八年前的檢查，確切的結果是什麼，如果當時便已發現體內腫瘤，為什麼不言明，如



果說檢查所得的資料不足以斷出病名，那麼那一句不祥的建議根據的是什麼？像這些疑問，於今也只有委之於有心的專家來做一番事後檢討，這也可能同時解開賴會兄八年間不曾停斷的運動究竟是正作用還是負作用的問題，說不定還可以對老年運動的種種層面的得失問題提供一些參考實例。

賴會兄終於沒能克服他的病根，但這不是他的錯失。他盡了體力和心力，抑制了病情的惡化，這份勇氣和耐心，不是尋常人所能比，

是值得我們景仰的。年輕時，他曾經爲了在一個驟變的社會中追求理想而付出了沉重的代價，誰能說他的病不是種因在那一段黑牢和荒島上的艱苦生活呢。老來還能鼓起餘勇鬥病，以一個社會鬥士的豁達和技術專才的冷徹，周旋抗爭於病魔糾纏中長達八年，始終不曾喪失其旺盛的鬥志，盡量使生活充實，他的晚年，真可以用「鬥士鬥病死而後已」八個字來表彰其壯志，也替我們這些垂老難友們指出了一點生命奮鬥的真諦。

/ 苦 苓

# 國家、國家

慈林教育基金會 典藏

愛我們的國家  
國家在那裡？  
在飄揚的國旗上嗎  
雨天就降下來  
有時淋濕了，奄奄一息  
我只聽到國慶日  
革命先烈在旗子裡  
哭泣的聲音

愛我們的國家  
國家在那裡？  
在元首的臉孔上嗎  
皺紋越來越多  
像尚未鋪設的鐵公路  
我只看到百年後  
第一萬個銅像落成  
長得都一樣

愛我們的國家  
國家在那裡？  
在脚踏的土地上嗎  
鳥不語花不香  
只有二十座核能廢電廠  
我只想找一支槳  
把這個島悄悄划走  
再也不回來

愛我們的國家  
國家在那裡？  
原來都寫在歷史上  
是從前的強國  
將來復興了，光芒萬丈  
我只有小小願望  
當孩子出生的時候  
有國家可愛

# 前方

## 雜誌

1987年2月出版・第1期

發行人／蔡裕榮  
總編輯／林華洲  
編輯／李興民・陳崇北  
編輯部／台北市臥龍街195巷38號5樓  
電話／(02)7328478  
郵撥帳號／1025072林華洲帳戶  
郵政信箱／台北郵政29-247號  
發行所／台北市景美區景隆街56號  
零售價格／每冊66元  
長期訂戶／全年660元・半年350元  
出版登記／局版台誌第1604號

### 編後語

值此歲末年初，本刊以《春天的祝願》為題發刊，卑之無甚高論，不過是對一個新的歷史時期的虔誠祝願而已。

台灣的經濟發展造就了一個飽食的社會，但飽食的結果並不是「知榮辱」，而是「思淫慾」，只要看看從南到北，由鄉至城，泛濫於大街小巷的色情行業就可以明白。原住民落後、脆弱的經濟結構，經不起資本主義的大力衝擊，終不免於土崩瓦解，結果是負債累累者有之，賣兒賣女者有之。女性身體的商品化，一如男性勞動力的商品化，都是人的物化、非人化的現象之一。本期封面故事《山地悲歌滿台灣》一文，為雅美族青年施努來寫元月十日華西街示威遊行實況，並抒感想，看他高舉抗議牌

（見封面）的激忿神情，可以想見其作為原住民一份子，面對自己民族悲運的沉痛心情。

去年底的中央民代選舉，是台灣劃時代以兩黨競爭的態勢所進行的頭一次選舉，但也只類似於美國之有民主、共和兩黨，雖然在政見上以全民為訴求對象，但實際上並沒有那麼大的涵蓋性，比如工人、農民的利益就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因為他們在政治上還沒有真正的代言人，江澤先生的文章，主要即在說明這一點。

民進黨成立之後，受到各方關切，而一向主張「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部分」、「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政問題」的中共，到底怎麼看待這個「新生事物」呢？特轉載香港《廣角鏡》月刊上韋伍先生的一篇文章，提供給有心瞭解的讀者參考。

民進黨因為黨中央罷選監委的決議，不為有監委選舉權的公職黨員所同意，起了軒然大波，造成黨的領導機關和從政黨員之間的暗中較勁，民進

黨內到底誰在領導呢？張大林先生的文章對這一點做了透澈的剖析，有助於大家對民進黨的了解。

最近兩個月以來，大陸的學潮成為全世界注目的焦點，因為這不僅僅是校園騷動、學生鬧事這樣簡單的事情而已，還牽涉到改革、現代化等等層面的錯綜複雜的問題。無獨有偶，台灣的校園在前一陣子也頗不平靜，台大校園先有「李文忠退學事件」，李遠哲回國之後，又掀起了「教授投校」運動，一時風起雲湧，頗有蔚成風潮之勢，本刊特委請林涯先生翻譯《警察沿革誌》中關於學生運動部份，分期刊登，以古鑑今，應有可以借助之處。

綠島歲月永留無窮追憶，風雨故人之情更難忘懷，勞歸悼念傅賴會同學的文章，情深意遠，令人低迴。

《前方》是份新刊雜誌，一切都在摸索之中，希望大家能不吝指正，共同規劃出一個正確的方向。